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廖舜右博士

社會建構學派對兩岸不對稱認  
同之研析



碩士班研究生：翁浩然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架構.....	4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7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10
第五節 章節安排.....	11
第二章 兩個傳統與國際關係典範.....	15
第一節 兩個傳統.....	15
第二節 物質與概念的平衡.....	19
第三節 典範間的對立與對話.....	24
第三章 社會建構.....	29
第一節 建構的特性.....	29
第二節 社會建構的三種文化.....	41
第四章 兩岸關係的認同差異.....	59
第一節 國際層次.....	61
第二節 國內層次.....	69
第三節 認同差異的相互衝擊.....	74
第五章 結論.....	81
第一節 研究發現.....	81
第二節 後續研究.....	82
參考書目.....	85



# 表目次

表 2-1：分析層次的三次辯論.....	16
表 2-2：古典現實與新現實主義的大致異同.....	21
表 3-1：國家擁有的特徵.....	40
表 3-2：社會結構與物質結構的基本差異.....	49
表 3-3：Wendt 三個文化簡略說明.....	54
表 3-4：三種國際體系的比較.....	56



# 圖目次

圖 1-1：本文研究架構圖.....	6
圖 2-1：持續性複數理論競爭.....	26
圖 2-2：單一理論時期.....	27
圖 3-1：社會建構的定位.....	33
圖 3-2：Wendt 對國際關係其他理論的分類光譜定位.....	34
圖 3-3：文化、互動過程與國家實踐的關係圖.....	45
圖 3-4：能動者—結構之間的因果關係與建構關係.....	50
圖 4-1：兩岸關係認同差異的雙層次.....	61
圖 4-2：兩岸關係認同差異—國際層次.....	68
圖 4-3：兩岸關係認同差異—國內層次.....	70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中國崛起後，不論在經濟力、軍事力，以及國際影響力方面，皆大幅超越台灣，而由不均等的力量對比中產生一種思維：「中國已非吳下阿蒙，兩岸關係的主導權已由中國所掌握。」在整體物質條件或國力上，台灣已經比不上中國，而攸關台灣存亡的國際空間拓展行動成為重要的抗衡方式之一（本身實力不足，便需對外尋求盟友，以增加國力），<sup>1</sup>也是抗拒中國統戰策略或打壓行動的手段。然而，中國在正當性缺乏與使用武力存在受限可能性的情況下，轉以經貿交流來進行另一類型的統戰。近期的兩岸關係正是以此為背景，在互動上產生改變。

若單以結構現實主義觀點來看，兩岸關係在近期並未發生重大變化。<sup>2</sup>中國與台灣的軍事落差甚至國力落差依然一樣，而美國仍然是兩岸權力平衡背後的關鍵角色。然而，以社會建構觀點來看，兩岸關係實際上已發生變化。在觀念上的改變，除了造成新的發展狀況，也產生認同的差異與矛盾。

此外，不論在國際層次或者國內層次（台灣內部），都存在認同的差異。就國際層次而言，美國、中國、台灣，三個行為者對兩岸關係的認同皆有所不同。就國內層次來看，對兩岸關係的認同差異，進而產生一種群體的區別方式，即現今的執政黨、反對黨，以及一般民間。

---

<sup>1</sup> 現實學派認為，當實力不及對手時有兩種做法，第一種是對內增強實力，例如軍事、經濟等；第二種為向外尋求力量，即外交結盟等。詳見張亞中主編，2007，《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文化。頁 47-48。

<sup>2</sup> 高德源譯，2002，Jack Donnelly 著，《現實主義與國際關係》。台北：弘智文化。頁 20-24。

由於先前不同執政黨時期的兩岸關係方針，在高階政治與宣傳上明顯反對中國，雙方常是以牙還牙，使得台灣和中國的關係常處於針鋒相對的狀態，難以找出溝通的空間。直到 2008 年的政黨輪替後，這種無法溝通的狀態才有所改觀。

也就是說，2008 年期間是重要轉折點，台灣內部在對兩岸關係的認同上產生不一樣的思維。台灣新政府於 2008 年 5 月間正式上任，提倡外交休兵的台灣政府依循新方針，企圖建立兩岸友善發展。這不僅表示，由不同政黨執政的台灣，將對中國或兩岸狀態的認同有所差異，也同時指出，台灣內部對兩岸關係具有不同的認同。

在國際層次方面，胡錦濤於 2008 年 12 月 31 日，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30 周年座談會發表演說。<sup>3</sup>其主要內容表示，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兩岸可以在國際、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加強合作。

針對馬英九總統上任後提出的「兩岸外交休兵」政策，胡錦濤首度公開明確回應：「兩岸在涉外事務中避免不必要的內耗，有利於增進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對於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需求，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兩岸可經由協商，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這些也顯示出，中國對應台灣不同的兩岸方針，也會做出修正，產生不一樣的行為模式，也就是說，兩岸關係的轉變是有可能經由互動與建構而產生。但這也說明，中國與台灣目前對於兩

---

<sup>3</sup> 胡錦濤於 2008 年 12 月 31 日，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30 周年座談會發表演說，演說當中提及的各項重要的兩岸方針，成為俗稱的胡六點。詳見胡錦濤，2008，〈「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30 周年座談會演講稿〉，<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18824/2008/12/31/2225s2379738.htm>。

岸關係的認同是有所差別的。

另一方面，美國一直是兩岸問題的利害關係人，就美國利益而言，中國與台灣的現況關係蘊含不只一種的利益，或者說，美國希望兩岸關係需維持一種具備多重用途的狀態。在中國發表胡六點後，<sup>4</sup>中國對於兩岸關係的改善也開始策劃或實行多項措施。近期兩岸關係的友好互動比起以往增加許多，這些情況對於美國的觀感，以及美國的台海策略也可能是新的發展變數。

在中國改革開放後，美國或許只需評估中國運用經貿活動所提升的實力，而現在可能必須評估台灣的盟友保證程度。不論如何，美國仍然保有其對兩岸關係的認同，並且期望現實能符合其認同。整體而言，兩岸關係的複雜度，似乎除了結構現實主義之外，還可運用社會建構概念來一探究竟。

此外，本研究之動機也來自於 Wendt 社會建構的一項理念，Wendt 認為結構現實主義所提出的無政府狀態是重要的發展，但卻不能侷限於此，無政府是一個創新的開端，往後的學者應該更進一步去思考。因此，Wendt 定位其社會建構的出發點為一新的嘗試，更強調不相容的本體論與方法論能夠有所連結，產生一條中間道路。本研究將接續這種創新的理念，嘗試運用社會建構來進行兩岸關係的研究。

一直以來，物質與觀念因素一直是國際關係理論的主要分歧，不論是過去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或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等辯論中，物質與觀念因素對國家行為的影響力仍是爭辯的要

---

<sup>4</sup> 取自演說中的六項方針，大致上為：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經濟合作，促進共同發展；弘揚中華文化，加強精神紐帶；加強人員往來，擴大各界交流；維護國家主權，協商涉外事務；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詳細內容同上註網址。

點。即便在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領域與方向，經由辯論成果拓展至今，但物質與觀念因素的對峙仍舊持續。

就國際關係理論運用而言，兩岸關係對現實主義，特別是結構現實主義，物質因素諸如軍事力量、既定的國家利益與國際體系等便已足夠解釋兩岸關係局勢的相關議題。

然而，這些物質因素卻只能解釋部分特定現象。正因為沒有任何單一國際關係理論能提出滿意的解釋與預測，若現實學派只是一種角度觀察，則社會建構主義的角度，或許能讓被觀察的事物能有更豐富與精確的樣貌。

本研究除了企圖運用 Wendt 社會建構主義的相關概念進行探討，不同行為者對於兩岸關係的認同之外，也希望能先藉由討論社會科學的兩個研究傳統，來找出社會建構主義的價值與立場。接著對 Wendt 社會建構的內容進行探究後，再進入兩岸關係的認同之相關討論。實際上，本論文或許可以作為，對社會建構主義在應用可能性方面的實驗。

##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架構

除了想用不同的透鏡觀察兩岸關係的動機之外，實際上也是對於社會建構進行運用挑戰。在研究問題方面，除了假設在兩岸關係存在觀念因素之外，也強調觀念的重要性不可忽視。

正如 Wendt 的立場一般，雖然 Wendt 一開始對於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物質觀點進行許多批判，然而其理論的中心並非如此，這些批判只是用來說明其社會建構主義的特殊性，凸顯其與主流國際關係理論有所差異，且 Wendt 自身也對於觀念無所不

在的觀點抱持疑問，這表示 Wendt 的立場並非處在完全的觀念主義或反思主義之陣營。

因此，本文將對社會科學的兩個傳統進行探討，以便輔證 Wendt 建立中間路線的背景，以及實踐中庸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於兩岸關係認同方面的議題，則需留到後續再行討論。而問題假設上，本論文假設，兩岸關係無法以單純的物質因素解釋，概念因素應扮演自變數或至少中間變數的角色；另一方面，國際層次和國內層次中，各層次的行為體對兩岸關係有不同的認同，也需納入考量。

在流程方面，主要先討論社會建構的生成背景，然後說明社會建構的相關概念，最後再進入到兩岸關係認同差異的議題。研究架構如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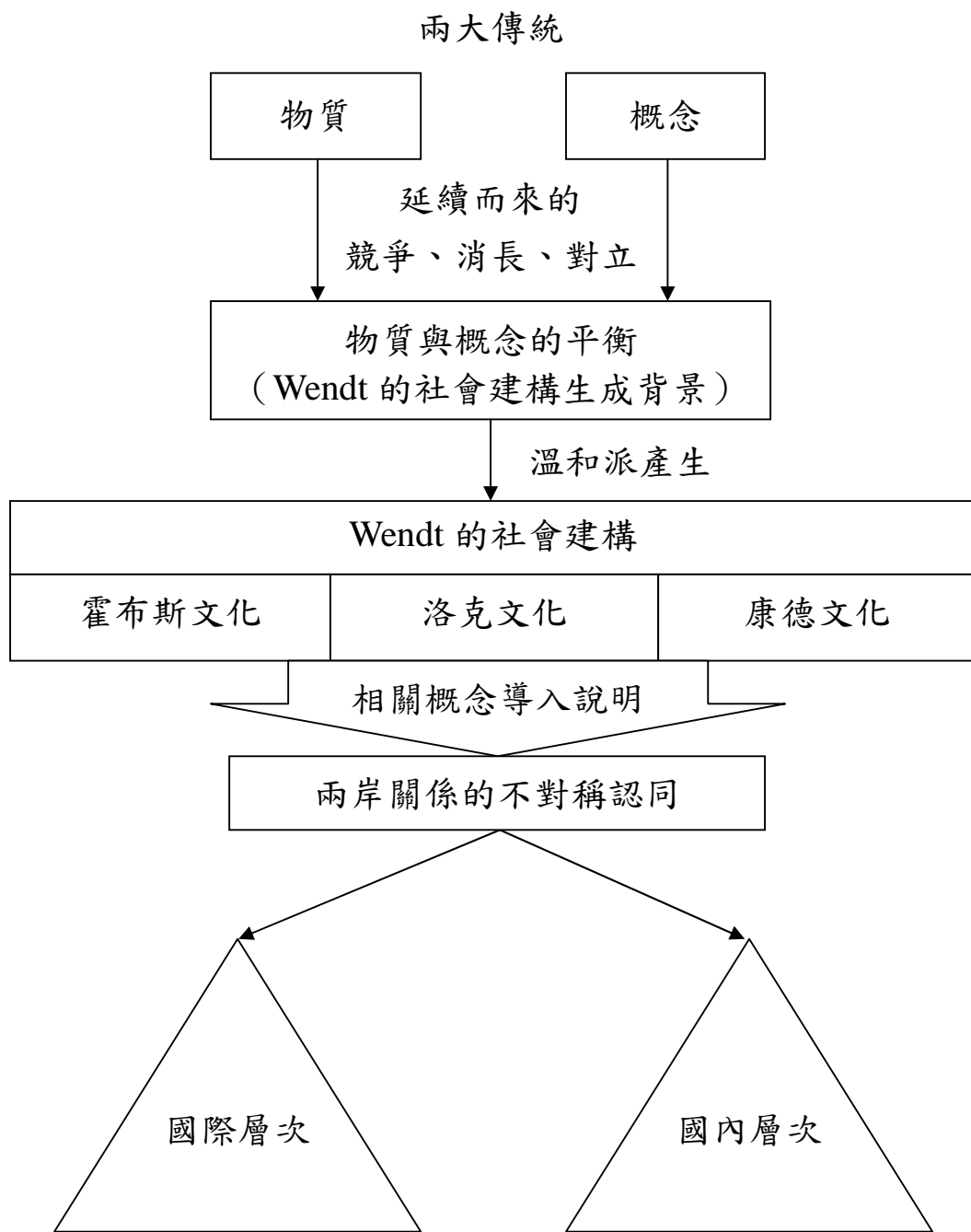


圖 1-1：本文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主要參考自 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1991,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lexander Wendt,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研究途徑(Research Approach)是一種常用於不同學科的「方向」標準，是從一種研究的面向切入，所進行的分析、歸納與觀察的研究。<sup>5</sup>一般而言，也就是指選擇問題與運用相關資料的標準。研究途徑一般概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取向」的研究途徑，不同學科將出現不同的研究取向；第二類是以研究「概念」為主要的研究途徑，以研究各學科特質的研究途徑。研究途徑，乃指研究者對於研究對象的研究，到底是從哪一層次為出發點、著眼點、入手處，去進行觀察、歸納、分類與分析。<sup>6</sup>一般而言，社會科學的研究途徑有哲學、歷史、法律、社會、心理、行為等研究途徑，為進入問題的研究途徑。

本研究採用社會建構的觀點來討論兩岸關係的認同差異，主要是以 Wendt 社會建構的相關概念來探討兩岸關係的複雜度。雖然以觀念方面的相關事物為主要探討內容，卻不否認物質因素的存在。不過也有別於以描述事實及建立事實與事實之間的因果關聯為目的的歷史研究，歷史研究屬於經驗研究的領域，不論在研究的對象上、題材的選擇上、解釋的需要上及理論的依賴上都具有一般經驗科學的基礎。<sup>7</sup>

本論文研究不同行為者之間對於兩岸關係的認同，透過各行為者在政策方針、外交互動等特點及習性來探討它們對兩岸關係的認同差異，某種程度將需要由歷史研究作為背景因素的基礎，一方面可以檢視各行為者在看待兩岸關係的歷史進程中彼此互動的情形還有政策影響，以及區域內主要行為者對於區域所產生的

---

<sup>5</sup> 朱浚源，1999，《撰寫碩博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書局，頁 162。

<sup>6</sup> 同上註，頁 182。

<sup>7</sup> 易君博，2006，《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頁 164-169。

影響；另一方面，就建構關係而言，並非以預測為主要目的，但也將討論不同文化認同的差異下，可能發生的轉變與衝擊。

在研究方法方面，所謂研究方法是指資料蒐集及處理的技術，<sup>8</sup>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將混合採用文獻分析法、歷史分析法及歷史/比較研究法，透過「歷史」反映了過去的實況，再藉由「文獻」重現歷史的重要場景，進而比較不同時期的歷史發展經驗，歸納出不同行為者對於兩岸關係所產生的認同差異，與其背後因素，進一步討論未來可能的發展。以下是各方法之簡介以及在本文的運用說明。

## 壹、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主要透過既有的文獻資料，包括官方與學術專論等，作為資料來源與分析基礎，是一種純化的客觀界定、評鑑與綜合證明的研究方法，是社會科學研究經常使用的研究方法，以確定過去事件的真實性；其目的在於辨別真偽、推敲歷史、洞悉現在，並預測未來。<sup>9</sup>

文獻分析法是一種十分傳統典型的分析方法，根據魏鏞所謂「非實驗性的方法」，是有別於全憑臆斷來解說事理，而是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透過各種既存的史料來驗證學者對某一事物的看法，並剖析其涵義，以期推敲其淵源及影響或找出真相。<sup>10</sup>而資料蒐集也是調查或研究的重要過程，在確立主題以後，就開始針對研究主題以及性質，蒐集相關的資料，以確立研究問題的性質以及現況，以便更為明確的訂定研究內容。因此其主要目的在「瞭

---

<sup>8</sup> 易君博，1990，《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頁98。

<sup>9</sup> 葉至誠、葉立誠，2001，《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台北：商鼎出版社，頁101-104。

<sup>10</sup> 趙明義，1994，《國際區域研究》。台北：黎明文化，頁3-4。



解過去、洞悉現在、預測未來」。<sup>11</sup>

本論文為了說明兩岸關係在國內層次與國際層次的認同混亂與相關問題，除了以物質因素為考量外，也加入了概念因素。將盡可能透過蒐集相關的期刊、書籍、報章雜誌、論文、專書、研究報告、政府出版品、網路報導，特別需要收集政府、學者、智庫等相關的見解與意見，進行分析，並據以進行整理、分析與研判。論文的主軸是由社會科學兩大傳統至國際關係出現中立理論的探討，再運用社會建構來對兩岸關係的認同差別進行討論與試驗。

## 貳、歷史研究法

由於研究客體主要為過去發展的歷史與已經發生的事件，因此採用歷史研究法，如果脫離歷史的發展去看某些概念、現象、政策，那就較無法作出符合歷史事實的分析；過去歷史研究法偏重於因果關係的解釋，以期能經由對於過去史實的發現，來瞭解及解釋目前現象。歷史研究法有幾個特點：<sup>12</sup>所研究的事情是過去，而非目前發生的；所運用的資料也是過去的紀錄；是一種間接而非直接的觀察研究；在某種限度之內，可以幫助了解過去，解釋現在，以及推測未來。

由於中立的社會建構具備中庸的性質，比起國際關係主流學派在認識論方面的堅持和對立，選擇中間路線的社會建構更重視本體論的基礎，且不認為需要否認或放棄使用相互對立的認識論，因此並不全盤否認因果關係，也就是說，歷史的因果也可以作為一個行為者的背景因素考量。

---

<sup>11</sup> 同註9，頁102-105。

<sup>12</sup> 韓培爾編著，2003，《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Q&A》。台北：風雲論壇，頁231。

## 參、比較研究法

比較研究法是一種比較的研究方法，是指相對關係的比較研究。而比較研究的基本方法有比較兩者間的差異程度，在舉證不同因而產生不同果，不同現象的因果關係不能混為一談；與比較兩者間的相同程度，其目的在解釋或預測類似情形的因，應該產生相同的果，以作為類案的援引或為借鑑。<sup>13</sup>

在本論文中所要比較的項目包含兩大傳統的差異、社會建構與主流理論的不同點，以及兩岸關係認同方面的比較主要分為：於國際層次，台灣、美國、中國，三者之間對於兩岸關係的認同；於國內層次，即台灣內部，三個行為群體的對於兩岸關係的認同差。

###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文在討論理論發展背景與內容時，將會運用較多的篇幅來說明。此外，本文與其說是對兩岸關係認同差異的探討，不如說是對 Wendt 社會建構的探討與應用，而應用的主題便是兩岸關係的認同差異。而本文中提到的「文化」，與一般社會或種族之間所謂的傳統文化是不相等的，本文中的「文化」一詞，將特指 Wendt 社會建構中所提到的認同文化。

在兩岸關係認同差異的時間範圍限制上，主要是在 2000 年之後的兩岸關係，基本上以目前的狀況為主軸，回顧過去至今的改變，例如不同政黨的兩岸方針對兩岸關係認同也不同，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也會帶來不一樣的狀況。而主要討論的行為者或行為

---

<sup>13</sup> 陳偉華，2003，《軍事研究方法論》。桃園：國防大學，頁 153。

群體為兩岸關係的重要關係者，即中國、美國、台灣，三者各自有不同的文化認同。

在台灣內部的部分則是以執政黨、反對黨、一般民間進行命名，區別三種不同的文化認同類別。在研究限制方面，在用社會建構討論兩岸關係認同差異時，需於國際與國內層次跳動。也就是說，除參雜概念與物質因素，在分析層次上也需轉換國際與國內層次。至於美國與中國的國內部分則不做討論，以國際層面為主。

## 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文的寫作將文為五章，第一章說明研究動機、目的與研究架構，以及章節安排等部分。由於在本文前面的部分已經說明，故不再於此贅述。

本文於第二章將介紹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兩個傳統，用來探討對物質與概念、外部觀察者與內部觀察者、解釋與理解、結構與個體等分立的狀態，藉此做為討論 Wendt 社會建構前的背景，有助於在第三章了解 Wendt 在定位其中間路線的社會建構與其他理論時的觀點。第二章主要討論的是，物質因素與概念因素在國際關係中持續以不同的樣貌進行競爭，簡言之，爭執點在於，應該以物質因素與觀點為主，或者是概念因素及觀點為主，來探討這個世界。

另一方面，以現實學派為例，說明同一學派的後續流派能夠一派相傳一些核心概念，卻又能產生極為不同的觀點，最後，參雜物質與概念的新古典現實學派出現。突顯出並非只有 Wendt 的社會建構主義以對話橋梁的立場出現。不論如何，不同立場的理

論間雖然持續競爭衝擊，但不代表沒有對話的可能性存在。主流理論後延伸的分支或新產生的理論，逐漸將物質與概念因素加入混用，成為一種物質與概念因素皆可探討的平衡狀態，而這同時也是社會建構的重要思維之一。

在第三章的前半部，首先將大致介紹建構理論的緣起，以及諸多建構主義的流派與差異，並說明 Wendt 社會建構的類別。其次，將會介紹 Wendt 社會建構的基本觀點，特別是對所要研究的「這個世界」的看法，此外，也討論 Wendt 如何定位其中間路線的社會建構，以及定位其他理論。接著是討論科學實在論對於 Wendt 社會建構的重要性，與其重視本體論的思維，然後討論 Wendt 對國家行為者是如何定義、看待。

在第三章的後半，討論 Wendt 社會建構中對無政府狀態的看法、有關觀念與認同，以及認同如何產生等相關議題。此外，也將說明因果及建構關係的差異，以及 Wendt 社會建構所採取的建構關係是如何運作的。然後討論 Wendt 社會建構中所提出的，至少存在三個文化認同的相關議題，也就是三種無政府文化。分別為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以及康德文化。三種不同文化認同，有不一樣的邏輯、角色認同，因此，行為者也將對應這些差異，有著不一樣的行為模式。這些都將作為討論兩岸關係認同差異議題的重要基礎。

第四章則是將先前所探討的 Wendt 社會建構之觀點，帶入兩岸關係認同差異的問題來進行討論。因為就現實學派而言，兩岸關係自美國介入後，並未發生重大變化。中國與台灣的軍事落差等物質實力不均依然一樣，且美國仍是兩岸權力平衡背後的關鍵角色。但若以社會建構來看，自中國走入國際社會（主要是洛克

文化)後,兩岸關係也由衝突模式轉換為穩定發展模式。然而,其背後卻存在難以解決的認同差異問題。認同問題又分別發生在兩個層次,一為國際層次,一為國內層次(台灣內部)。

在國際層次,主要的相關行為者是美國、中國,以及台灣三方,對於兩岸關係處於何種狀態進行探討;在國內層次中,討論台灣內部對於兩岸關係處於何種狀態,有著不同的意見群體。相關的認同議題將用 Wendt 社會建構的觀點來進行說明。另外,此處所討論的認同並非認知,認知將有正確與錯誤的存在,因為有一定的正確標準或是實際事實,但是認同並非如此。足夠以自身來界定自我的認同是存在的,而參雜他者來界定的認同,則也沒有正確或錯誤的意涵存在。參雜他者來界定的認同,其重點在於行為者的改變,是身不由己的。因此,第四章也討論,當不同的行為者的不同界定與認同差異相互碰撞時,可能產生的情況。

第五章為結論,作為最後總結本文關於 Wendt 社會建構在運用可能性的心得與成效,也是總結對 Wendt 社會建構的了解,並在之後說明未來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 第二章 兩個傳統與國際關係典範

### 第一節 兩個傳統

社會科學發展至今，主要由兩個智識(intellectual)傳統所滋潤而來。其中，外部觀察者(outsider)運用自然科學方法尋求「解釋」自然的運作並看待人類領域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內部觀察者(insider)要人理解事件的意義。即 outsider 求解釋(explaining)；insider 求理解(understanding)。前者模仿自然科學方法來尋找因果關係作出解釋；後者著重在觀察人的信仰和慾望（影響外在行為）以理解根本的理由，以及事件的真正意義。

另外，關於分析層次，最主要分為：由上而下(top-down)的系統到單元，以及由下而上(bottom-up)的單元至系統。並且在每個國家，較高階層的單元成為較低階層的系統。例如，針對分析層次問題的三次的爭論中所產生對立層次，或者看似逐次細分，實際上也是符合上述最基礎的分類方式而產生。

表 2-1 說明了分析層次的三次辯論之對峙，第一次辯論中，由上而下讓國際系統完全地佔優勢，而由下而上反駁認為那是國家(Nation state)所為之總和(sum)。在第二次辯論，由上而下視國家為單一行為者，並理性地回應其情況，而由下而上視國家行為乃國內官僚(Bureaucracy)討價還價的結果。到了第三次辯論，由上而下主張官僚需要主導控制個體選擇，而由下而上認為個體選擇乃是集體決議分析的核心（基本單位）。

表 2-1：分析層次的三次辯論

Levels of analysis: first debate	International system vs. Nation state
Levels of analysis: second debate	Nation state vs. Bureaucracy
Levels of analysis: third debate	Bureaucracy vs. Individual

資料來源：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1991,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不論如何，每回辯論都有向下修正直到個體，這代表的並非分析層級共有幾層級，而是觀察方向的其實只有兩種差異。但由最小的個體層級直到被稱為整體大環境的層級，在這最高與最低之間則可能有近似無限多的對立出發點。因此，前述 top-down 的系統到單元，以及 bottom-up 的單元至系統的分類法，或許才是最為明確的分類方式。

## 壹、傳統一解釋

國際關係學科受到科學概念許多影響，而現實主義是最著名的代表，除了提倡科學方法的應用，也抵制理想主義的空想理念。科學歷史與哲學中的重要概念除了在國際關係中具有影響力之外，科學解釋的許多概念也適合應用在國際關係研究中。

在 16、17 世紀的科學革命中，科學是十分嚴謹的，在數理學科中的科學性邏輯是不容許例外的，比如像對一個假設來說，例



外不是不太可能而是不可能。然而我們的知識乃始自於我們的五感所告知而來，一個科學的完整系統最終還是會依靠經驗與觀察，因此科學並非全知全能。

實證科學從發現自然中的規律性提出歸納假設，並進行演繹推論，包含預測下個案例然後觀察其是否預測成功，直到最後結論發現完全無誤則假設成立，然而若受到駁斥則有兩條分支，其一是拋棄之，其二是修正之並重新以同樣流程進行驗證。因此，實證科學是由堅固的主體所構成。而其中，觀察是一項需要概念支持的理智活動，正如沒有被給予目標的學生，對於師長要求他們專注觀察的指令是無法執行的。其後行為主義出現，Allison 的 1962 古巴飛彈危機研究，顯示出同樣的事件可以被給予至少三種解釋，每一個有關於不同的事實，或相通的事實有不同的解釋，因此事實與解釋不能被分開。

實用主義認為事實為何並非重點，人對於現實的解釋，乃受到現實的影響，因此沒有事實是先於解釋，換言之，所謂的事實可說是人造，且因對象不同會有多元化的趨向。另一方面，Kuhn 關於典範的論述說明了，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並非處於直接競爭，前者依賴一個科學方法的觀點是後者所抵制的。各自有套系統方法，能處理的問題也一樣使各自有所侷限，且沒有具體中立條件來測試它們之間的決定性。這些都再再顯示出科學的中立在社會科學中是有問題的，它往往並非單純可輕易辨識的邏輯命題。

有人認為科學像模型製作(model-making)，有人認為科學有些像地圖製作(map-making)，但兩者皆認為只要是事實存在的皆需被再現。不論如何，先前對於科學實證的質疑並不代表自然科學是混亂的，只是對於國際關係學科來說，沒有一個決定性的科學解

釋準則能被依賴。針對現實主義的框架式迴避異例法，其實理論能與異例共存，預測的成功對解釋來說，既不是必要也不是充分。但對國際關係學門而言，有些建議卻認為理解才是目的，並非解釋。<sup>14</sup>

因此，對於國際關係學科而言，唯心與唯物之間的主流線條是持續波動的，而沒有直接競爭的各種理論，也只是根據本身的世界觀看待世界而有不同位置的事實，卻也沒有決定性的優劣可言，只有啟發新的想法與概念似乎才是價值所在，而這些新的想法與見解，或許可以被稱為對這個所觀察的世界之理解。

## 貳、傳統一理解

社會科學並非完全延著自然科學的路線發展而來，並且在本質上，社會性的互動關係產物，有無法以自然科學方式解說的「意義」。而意義可以從個人經驗中找到，在符號互動中也存在，且深刻的追查還能分為符號的意義以及發信者藉此所想表達之意義，因此對社會的行為者而言，觀念(ideas)是帶有其自身意涵的，並且這些是科學無法量化測量的。

從韋伯的社會行為（考慮到其他人行為且因而以此為其方向的行動）以及一般邏輯行為的區別來看，例如：「因下雨而撐傘」並非社會行為；而「觀看交通信號並按照信號意義駕駛」則屬於社會行為。此外，於「觀看交通信號並按照信號意義駕駛」一例中，也能發現意義是相關規則所賦予的，若信號只是單純的信號，則對於駕駛者而言是無意義的或是無法理解的。而有關理性能動者的標準（假設），其實在實踐上，能動者不太可能有完整的與前

---

<sup>14</sup> 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1991,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44.

後一致的偏好，部分因為它們所想要的時常受到其信念（或觀念）的影響，而且它們也不可能完美的資訊。因此要以科學的方式解釋這些人類社會性的因素（例如，能動者目的之源頭或合理性）是很難的。

另外，Irving Janis 發展的一個外交決策解釋—「集體思考」，根據該解釋，決策團體的成員可能無法在一個主流或被推薦的行動方向環境中，順利或有意願地表達其意見（異議）。理由有可能是為了與團體其餘的人保持良好關係，或是該環境下的壓迫，又或者是自我懷疑等膽怯因素。然而，這種情況造成「虛假的一致意見」成為「共識」的後果是政策失敗。藉由以上例子也能得知，以自然科學方法在這方面可能只看到決策團體的共識與結果，而忽視略過被稱為黑盒子的決策過程，這些決策結果似乎不是具代表性及理性的。

若把理解 and 解釋作為對事物不同觀測的方式來看，對社會科學而言，理解可能必須先行，而後才是解釋。因此，理解對於社會科學來說是重要的起點，若對於社會性質的活動無法先做出適當的理解，則其後的任何研究成果可能都是種規避社會性的化約論，甚至產生虛假的結論。但若使用得當，在處理問題時加以細分，根據兩者本質的不同，各自有適合的時機，當從事自然科學時則運用解釋；當涉及社會生活的意義時則可能要先注重理解。

## 第二節 物質與概念的平衡

在國際關係「典範」及「理論」的使用雖沒有一定標準，但「理論」源自自然科學，其嚴謹度、一致普遍的解釋及預測功能都不是變項因素複雜的社會科學能輕易達到的，因此嚴格來說，至今尚無一套真正完整的理論，故使用典範比理論合適。同理，

不論是新現實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皆是如此，甚至社會建構更是明顯，客觀來看，社會建構的完成度要比起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低。此外，若加入分支流派的事實，實際上使用典範來稱呼這些國際關係學門的不同學派，的確是合適。

以現實主義典範的緣起與發展為例，當代現實主義至少包括：古典、結構、攻勢、守勢、新古典現實主義等分支。雖然各自在論述上有所差異，但基本概念卻是一脈相承，諸如：國際無政府狀態、國家為一致理性的行為者，以及權力是獨立變項等。

而關於權力，不論是驅使他者行為與否的能力之說，或是行為者本身物質與非物質的能力之論，權力都是種「相對」的概念，比如結構現實也強調相對收益。由於權力因素是足以直接影響國家行為的獨立變項，即便有其他中間變項也是「相對」不重要。關於一致與理性的抽象主觀判定，國家的一致性能比擬為撞球，球的內部成分一致，行進時也只有一個方向，然而理性則更為根本因素。

以古典現實和新現實主義為例（詳見表 2-2），即便同被歸為現實學派並包含一脈相傳的共通點，仍舊有不少的差異。其實分支所以產生，正是社會科學的變項因素複雜所致，這也更加突顯了至今尚無一套真正完整的理論之事實。因此，即便社會建構的完成度不如其它發展時間較長的典範，仍然能被運用，甚至進行補充修改，增加其完成度。

表 2-2：古典現實與新現實主義的大致異同

主要共通點	古典現實	新現實
國家中心。即國際政治的主要行為者乃為主權國家		
對無政府狀態的認知。國家在險惡中需自助，且合作不易達成		
權力與安全是最重要的議題		
以實證主義作為研究途徑。唯在事實與價值劃分上有些微差距		
主要相異處	古典現實	新現實
分析層次（簡約 vs. 系統）	個體單元。國家	整體結構
道德議題	討論國家道德與世俗道德的差異性	完全不討論
國家角色	認為主權國家為政治制度最終形式有待討論	認為主權國家為政治制度最終形式
權力角色	認為追求權力乃最終目標	將權力當成逐利（安全）的手段
理論建構	認為理論是事實的重現	認為理論要能解釋通則的抽象假設
對權力平衡的看法	認為權力平衡是決策者精心設計操控	認為權力平衡會因國際體系結構自動形成

資料來源：張亞中主編，2007，《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文化。頁 44-49。

另一方面，與社會建構有相似理念的新古典現實學派（同樣跨越了物質概念的對立界線），在維持現實主義作為國際關係理論主流研究典範的前提下，嘗試接合新現實主義之結構體系觀點以及古典現實主義 Morgenthau 注重之領導人認知與國內政治觀點，而成為二元認識論的現實主義。

在概念因素方面，滿足現狀與不滿足現狀（修正主義）將影響其選擇 Balance of power 或 Bandwagon。另外，相對收益與絕對收益則影響合作與否，但實際上無法精確測量，就此，Randall Schweller 強調應以收益平衡來解釋（玩家不只兩國在比較）。在非結構因素中，軍事技術被認為不屬於結構或單位因素，而是介於中間且對結構有影響力，以軍事技術的攻守平衡以及攻守的可區分性（可判別軍武攻守性質則意圖也容易判定）來強化結構因素的解釋力。

實際上，於東亞安全研究相關的資料方面，現實主義的壟斷性隨處可見，兩岸關係的研究也包含在東亞安全研究的範疇之中。不論是知名國際關係理論大師，如 Kenneth Waltz、John Mearsheimer 及 Barry Buazn 或安全議題研究專家，如 Richard Samnells、Micheal Yahuda 及 Peter Van Ness 均以現實主義為基本架構來研究東亞地區的安全相關議題。

雖然這些知名學者對現實主義或有些微不同的觀點及運用，但他們對東亞安全議題的研究取向仍限於現實主義的範疇之內。對於他們而言，似乎現實主義中的物質因素，如軍備質量、自然資源與綜合國力等已足夠對東亞安全議題提供滿意的解釋及預測。換言之，在東亞安全研究的重要文獻上，可以確信現實主義至今仍一枝獨秀。

另一方面，其它研究途徑，如社會建構學派與民主和平理論，雖已在西歐及北美地區的安全研究大放異彩，但這些新思維仍然只限於在西歐及北美地區範圍的運用。雖然東亞地區政經情勢在冷戰後已今非昔比，這些理論方面的新思維仍未被延伸並引用於東亞安全研究，在有關兩岸關係的研究上亦是如此，因此相關的

應用研究十分罕見。基於一樣的原因，本論文企圖以 Wendt 的社會建構主義之相關概念來闡述、說明兩岸關係的變化與狀態。

而就國際關係典範的發展來看，在各大辯論之後的社會建構主義與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相似之處也令人驚訝。似乎是對過去無法真正對話分歧，進行修正與反動，企圖建立一座連結過去看似不相容的要素之間，得以交互運用的新橋梁。若過去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因為同樣處於無政府的基點上進行辯論而得以對話。則社會建構主義與新古典現實的相似處是，同樣基於皆對物質因素與概念因素抱持關注的構想，以及兩者皆將過去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避而不談的概念因素加入討論中。

以國際關係理論的競爭來看，現實學派的轉變也同樣是對於物質與概念重視程度的差異。由古典現實主義對道德等概念無法割捨，直到新現實主義的出現，徹底捨棄概念因素，避而不談，然後如同物極必反似地，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出現，使得現實學派產生了重視物質—概念程度的波動起伏。

總之，同為現實學派的新古典現實主義也認為，國家試圖運用其權力，讓國際情勢符合自身的目標。因此強權國家比起其他權力較弱的國家，在執行外交政策時所發揮的影響力也更大。不過，在國家決定對外部的回應方式時，卻也受到國際政治、國家結構，以及決策菁英（心理狀態）的影響。這顯示出，除了社會建構之外，近來新興的國關典範再度重拾對非結構因素與概念因素。因此，本文也將運用新古典現實的理念，加入概念因素與非結構因素來探討兩岸關係。

### 第三節 典範的對立與對話

Ole Waver 認為國際關係在過去有三個主要的典範，<sup>15</sup>現實主義(realism)，多元主義(pluralism)，激進主義(radicalism)，這些典範間的辯論沒有誰對誰錯，它們看到不同的重要事實，所用基礎及語言（自身的透視鏡）也不同，因此不能以一個標準來衡量不同的典範。然而由這三個典範所構成的主流三角關係卻是偏向一邊的（在 1970 年代，馬克思主義漸漸被視為非主流的國關理論），主要是現實主義與多元主義之間的隔空交火，Ole Waver 甚至認為是各說各話，因為沒有相同標準去檢視，而且四次辯論的主題都不同，所以典範間沒有真正的辯論。

但是到了 1980 年代中期及晚期，Ole Waver 認為已經不在典範間的辯論中了，因為不再不能比較。於著名的新-新辯論中，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能共用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基礎假設，兩方皆進行自我限制的重新定義到一個反抽象的，理論的極簡主義，並且它們因此變得漸漸可相容。有了交集，共用理性主義的研究典範後，一個優勢的新-新綜合體因而產生。

這使得辯論的主線轉移到相反的方向，成為理性主義者與反思主義者(reflectivists)之間的爭論。兩個主要極端變成，一端是新-新綜合體的理性主義，而另一端為反思主義(reflectivism)。此狀況下，理性端為了科學化的新現實主義分析層級已由個體跳脫來到系統層級，而新自由主義也放棄普世倫理道德的廣泛抽象概念，然而反思的一端卻拾起新-新所放棄的事物（即 statesman, ethics）。

在兩個極端的發展之下，極端理性主義者（理性選擇）與極

---

<sup>15</sup> Ole Waver 認為這種分法並非曖昧也非武斷，因為所有類型的分類研究(typology)是不確定的(problematic)。



端反國際關係途徑（解構主義者）之間的排斥漸漸增大。而後妥協(middle ground)的出現，來自理性主義一端的新制度主義者，以及來自反思主義一端的建構主義者。Ole Waver 認為溫和派（中間路線）的產生是正常的。

整體來看，一戰後的現實主義 vs.理想主義，重點在於國際關係學科應該重視實然面或應然面的批判（屬於兩個不同的典範），因此為各說各話；而第二次論戰為同一典範基礎假設下的方法論戰（屬同個典範之下），實際上乃內部性質的家庭戰爭；第三次的新-新辯論則被認為是國關本質的辯論（有著相同假設基礎得以比較），所以是真正辯論，至於第四次則為兩個極端的辯論（即理性主義&反思主義），是哲學面，關於研究理念的不同，屬於理念不合；而後出現的中間路線溫和派則試圖融合兩方（如英國學派即為兩端的中間點）。

其實稱得上辯論（不考慮典範與否）的是共用相同假設基礎的第二次與第三次，而第一次學科本質要求的差異與第四次的兩極分化是理念上不合，無法連結，特別的是中間路線的出現，似乎試圖將兩端拉回到有共同假設的舞台。

若運用 Imre Lakatos 對於科學進步所提出的「持續性複數理論競爭」（詳見圖 2-1）概念來觀察這些對立狀況，以及對話可能性的產生，中間路線的出現正如同兩條互相消長的波浪曲線，在時空的平移之下，產生交集的事實證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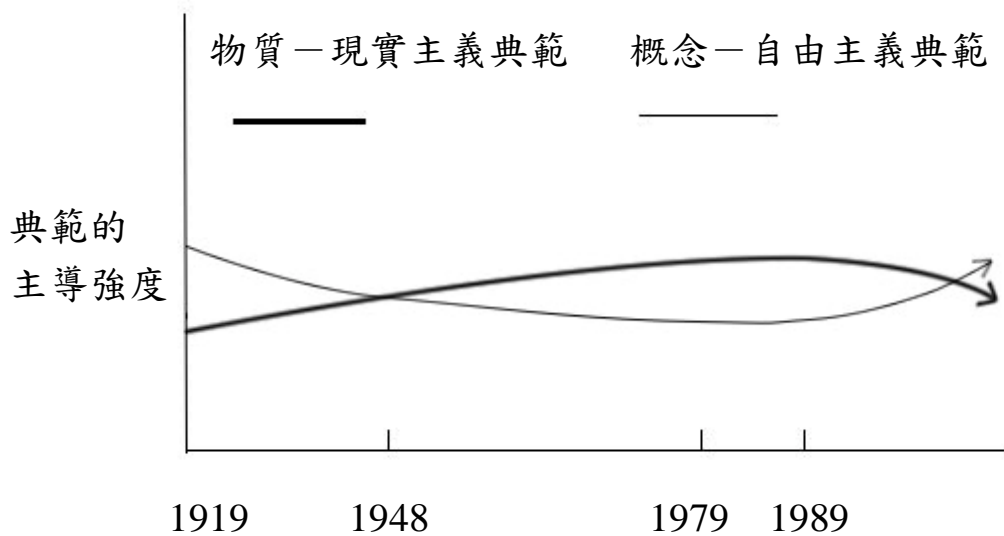


圖 2-1：持續性複數理論競爭

說明：Imre Lakatos 研究綱領間之持續競爭概念對於國際關係學門的應用。因典範的核心必須具備主體論述並具有方法論基礎，因此行為主義並不被視為典範。1948、1979 及 1989 被認為是典範移轉的年代，因為國際關係學門有許多重要著作或重要事件在這些年代出現，如 Hans Morgenthau 的 *Politics among Nations*，Kenneth Kenneth Waltz 的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以及冷戰的結束，而許多重要的建構理論著作也於 1989 年後紛紛出版。

資料來源：廖舜右，2006，〈Thomas Kuhn 與 Imre Lakatos 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爭論〉，《政治科學論叢》，第 29 期，頁 31-48。

也就是說，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物質與觀念因素的對峙不應該是一種零和遊戲。雖然，國際關係學門的三次大辯論對物質與觀念因素之重要性著墨已多，但在三次辯論中參與的各家學派總是一再重複相同的錯誤。

換而言之，每一學派均企圖獲得理論上的全面性主導權而非分享邏輯辯論後所凝聚的共識。然而，與 Thomas Kuhn 所主張的「單一理論時期」（詳見圖 2-1）之想法相互呼應的「掌握全面性主導權」的思維，在中間路線的產生後，卻顯得有些格格不入。

除了像是在反對此種理論上的全面性主導權之外，似乎也進一步說明了各個學派均有在闡述、解釋、及預測方面不同的貢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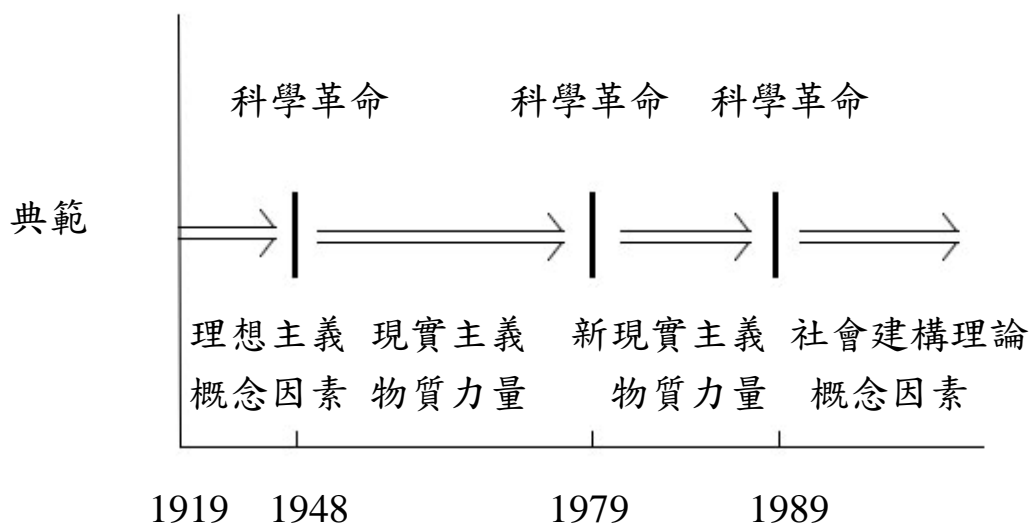


圖 2-2：單一理論時期

說明：圖 2-2 顯示 Thomas Kuhn 科學革命的概念對於國際關係學門的應用。因典範的核心必須具備主體論述並具有方法論基礎，因此行為主義並不被視為典範。1948、1979 及 1989 被認為是典範移轉的年代，因為國際關係學門有許多重要著作或重要事件在這些年代出現，如 Hans Morgenthau 的 *Politics among Nations*，Kenneth Kenneth Waltz 的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以及冷戰的結束。

資料來源：廖舜右，2006，〈Thomas Kuhn 與 Imre Lakatos 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爭論〉，《政治科學論叢》，第 29 期，頁 31-48。

自啟蒙時代後，科學進步的定義困擾知識份子已久。在有關科學進步的大型辯論中，理論總是最關鍵的議題，而多數學者對理論的功能亦已產生一定程度的共識。在國際關係領域內，闡述、解釋及預測等是理論的主要功能已成為國際關係學者的初步共識。但在理論的目的方面，國際關係學者起始便有很大的紛爭及辯論。Imre Lakatos 與 Thomas Kuhn 的主張便是爭鋒相對、相持不下。

Thomas Kuhn 的「單一理論時期」主張與 Imre Lakatos 的「持續性複數理論競爭」主張是辯論中的主要兩大陳營。然而在經過多年的辯論及討論後，Imre Lakatos 的說法已逐漸在國際關係領域中取得優勢地位。因此，在處理國際關係理論中物質與觀念因素的對峙時，不應該是在理論辯論上取得排他性的全面主導權，而應是以 Imre Lakatos 的「持續性複數理論競爭」概念，在理論辯論中尋求具備互補性的論點與共識。<sup>16</sup>這也間接顯示理論（或稱典範）之間，擁有對話的可能性。

---

<sup>16</sup> 廖舜右，2006，〈Thomas Kuhn 與 Imre Lakatos 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爭論〉，《政治科學論叢》，第 29 期，頁 31-48。

## 第三章 社會建構

### 第一節 建構的特性

本文主要討論的是 Wendt 的社會建構，然而在了解 Wendt 的社會建構之前，對於建構主義的背景、特性，以即許多分支的事實，也將先行介紹。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一詞源自於 1910 年代蘇聯藝術家與建築師，主要用來說明他們的新藝術活動，因為他們認為不論是藝術或是建築，基本上都是社會性的活動。<sup>17</sup>除了起源點，建構便與社會性有關聯性，但實際上社會建構的定義並非如此簡明。

Ian Hacking 指出，社會建構者主要是對現狀的批判，反對被現況認為不可避免的事物，針對不可避免性提出批判。社會建構者通常會主張某事物並非必然，但仍然存在；或者說不必然像目前一樣如此存在，並非不可避免的（如同 Wendt 提到觀念的存在與並進一步說明其存在的非必然性）。或者主張某事物的現存方式並不好、如果能改變將更好。不論如何 Ian Hacking 指出，這些主張之前必須有個前提條件，也就是在目前現況下，這個遭受社會建構批判的某事物是被視為理所當然，而似乎不可避免的。<sup>18</sup>

#### 壹、分支

國際關係學門中的建構主義並非單一一致的理論，而是緣自國際關係第三次大辯論以來，批判主流理論的一支。批判的各分支諸如：John G. Ruggie 社會學觀點，認為戰後國際建制能穩定運作乃因國家間相互主觀理解與認同，並導出實證方法不適用國際建制的研究。Robert W. Cox 批判理論，或稱一種歷史結構變遷觀

<sup>17</sup> 莫大華，2003，《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研究》。台北：時英，頁 93。

<sup>18</sup> Ian Hacking, 1999,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6-12.

點，它批評新現實主義將現狀當成永恆，沒有歷史性，故不能解釋國際關係變化，且事實上有隱藏性的規範與意識型態（非客觀）為強權服務。Richard K. Ashley 後現代主義，或稱一種知識建構觀點，除了批評新現實主義之外，尚有幾個重要概念，例如思維理念影響人類行為，現實是人類社會建構出來的產物。

Alexander E. Wendt 能動者—結構觀點，認為新現實主義是能動者理論非結構理論，並且把國家虛象化（只剩權力與追求利益）。此外，引進科學實在論的主張，認為能證明存在的因果機制關係也屬於科學解釋的範圍。Nicholas Greenwood Onuf 語言行為理論觀點，而其貢獻有：運用建構主義的名稱與內涵，為當時社會建構的特質與主張做了概念性概括、規則屬於建構性的本質，在國際關係有其重要性、質疑國際無政府狀態本質，認為並非只存在單一型態規則（結構）。<sup>19</sup>

另一方面，由於思想背景的差異，建構主義的分類成為其自身必須處理的一個重要課題。John Ruggie 認為，建構主義學派可依照不同程度形成光譜分類，大致上為三種，分別是新古典建構主義、後現代建構主義，以及介於兩者之間的建構主義。新古典建構主義即是 John Ruggie 自我認定的類別，而在知識論上偏好實用主義。而後現代建構主義則如同其名，認為正當性的社會科學不過是一種霸權論述，用來提供一個真理的機制，而因果性的建立則是一種妄想。

至於第三種類別，即介於後現代建構主義和新古典建構主義之間的建構主義，它結合兩邊，一方面同新古典建構學者，與主流理論共享某些特徵，另一方面也運用科學實在論。其中，

---

<sup>19</sup> 鄭瑞耀，〈國際關係「社會建構主義」評析〉，《歐美季刊》，第 15 卷，第 2 期，2001 夏季號，頁 199-229。

Alexander Wendt 則是這一類的學者。Wendt 強調他要建立的是一種溫和的、中庸的建構主義。<sup>20</sup>他反對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在知識論上採取極端對峙的立場，因而忽略對本體論的討論與重視。

## 貳、Wendt 的社會建構

大致而言，Wendt 的社會建構理論特性有：溫和（折衷）派，反對完全理念路線。強調本體論對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性，許多事物的存在與意義建立在理念思維架構基礎上（但非全部的事物）。Wendt 同樣認為國際社會包含能動者與國際結構，但提出角色說明，認為國家先於國際結構存在。而理念構成利益的內容，利益再構成權力分配的涵義，故而國際結構主要由國際理念分布所構成。

Wendt 認為無政府狀態是變數，為中空容器，不存在既定東西（可變換）。而國際文化是經由國家互動的實踐過程形成的。此外，國際社會結構的改變雖難，但卻不是不可能。而 Wendt 也指出建構主義具備兩項基本原則：第一，人類關係的結構主要由共有觀念(Shared Ideas)而不是由物質力量所決定；第二，有目的之行為體認同與利益是由這些共有觀念所建立而成，並非原先就有。

Wendt 提出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該理論比新現實與新自由主義更強調國際政治的「社會」性。從探討以國家為中心的國際關係理論中，說明此類理論的缺點（相對凸顯 Wendt 所提出的理論以及需求）。雖然 Wendt 的本體論是偏向理念或觀念的，但於認識論自稱實證主義（認為社會科學也是科學，並提出科學實在論），希望能將看似對立不相容的本體論與認識論觀點做融合，藉由建

---

<sup>20</sup> Alexander Wendt,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40.

立中間路線來說明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還有對話的空間，並非無法對話。

雖然 Wendt 社會建構的許多出發點是對 Waltz 所代表的新現實主義進行批判。然而 Wendt 社會建構主義卻也在許多方面，接續新現實主義所提出的假設：國際政治是無政府狀態、國家擁有攻擊能力、國家不能百分之百確定其他國家的意圖、求生存、理性、國家為分析單位、體系理論的重要。<sup>21</sup>

不論如何，Wendt 的社會建構與新現實主義仍有很大的區別。分別在整體或個體的方法論上；在物質主義或觀念主義上。依照社會科學的兩大智識傳統來看，也就是科學實證的解釋派，詮釋的理解派。在分析層次上則是區分為由上而下的整體主義，以及由下而上的個體主義。Wendt 希望以科學實在論，在結構所造成的差異方面，即結構主義的整體論與個體主義的個體方法論上，以及觀念造成的差異（對觀念重視的程度）方面，即知識論的物質主義與觀念主義之間，建立一個中庸理論。圖 3-1 即為 Wendt 對其社會建構的定位，以光譜分析來看，Wendt 社會建構正是處於中間點。

---

<sup>21</sup> Wendt, 1995,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p. 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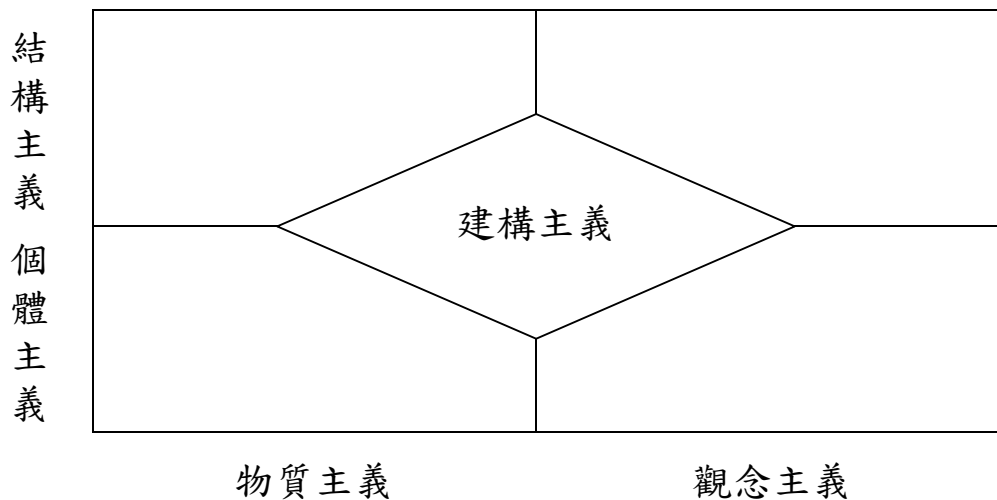


圖 3-1：社會建構的定位

資料來源：Emanuel Adler, 1997, "Seizing the Middle-Ground: Constructivism in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3, p. 331.

在國家結構方面，Wendt 於國家中心主義的論述中提到不可放棄國家為主的研究，否則將成為新現實主義的專利，也因為國家是重要中介者，能導入許多影響到世界體系中；在系統理論部份提到「不可能同時分析好幾件事」，因此系統理論有其價值，且不因國際政治有許多它所不能解釋的事物就忽略它所能解釋的事物與功能，此外它常與現實主義被等同化，但實際上並非只有現實主義才會（或能）運用。

針對目前國際關係學門的理論分類，Wendt 也有自身的一套想法，圖 3-2 即為 Wendt 的分類光譜座標。在分類的原因方面，大致上來說，新現實論述了結構，但其結構為常數，因此主要說明結構內國家權力分配的狀況（才有變化），加上採用個體經濟學的概念，故最後被歸在個體。而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在結構面有一樣的概念，但重視國際制度。新-葛蘭西馬克思主義更重視意識形態，但其物質色彩仍濃厚。至於後現代則是物質主義最嚴厲的批

評者。箭號指向及問號代表的是疑慮、可能性與不確定性，簡單來說，新現實主義將自身歸為整體主義，因為其強調結構，但該分類的方式與 Wendt 的想法相左。而新自由主義目前或未來是否涉及觀念主義（因為，實際上新現實與新自由皆是物質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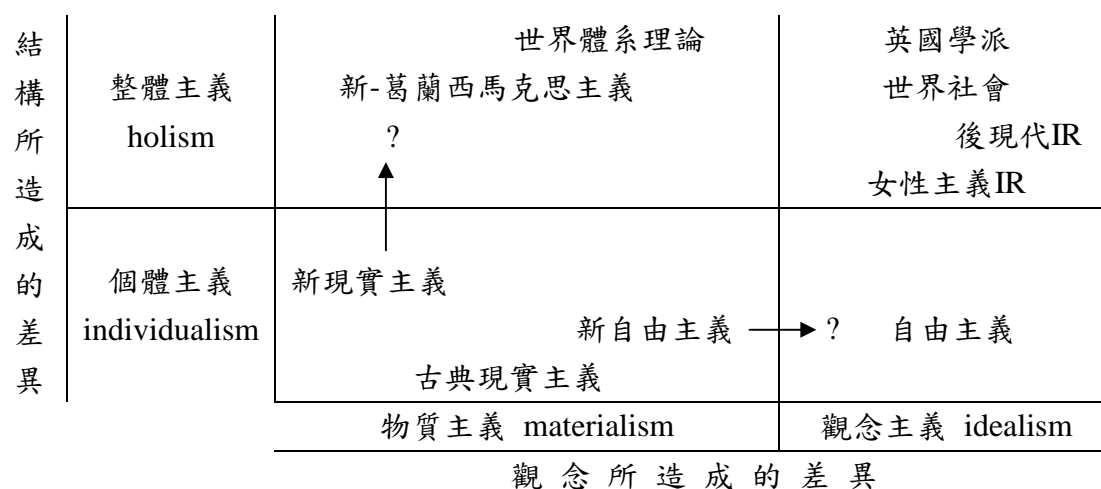


圖3-2：Wendt對國際關係其他理論的分類光譜定位

資料來源：Alexander Wendt,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32.

就Wendt對國際關係其他理論的分類光譜座標來看，除了四個基本類別之外，還依照Wendt說明的強弱，進一步運用光譜的方式定位進行修改。在物質—個體主義的象限中，包括新現實主義、古典現實主義，以及新自由主義。新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的物質能力分配結構，才是決定國際體系的因素，並且反對古典現實主義以抽象的人性、抽象的國家利益作為討論影響國家政策的因素。但Wendt認為新現實主義表面上看似結構論者，但實際上在方法論方面更依賴微觀經濟學個體主義的分析方法。

然而，比起古典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更具物質主義的傾向。古典現實主義認為人性是決定國家利益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屬於個體主義，且古典現實主義基本上是重視物質力量，並認為物質

力量對權力與國家利益的界定具有相當大的決定性影響，不論對於權力與國家利益的概念有許多不一樣的想法，該基礎幾乎是一致的。

對Wendt而言的整體主義，被放置在物質—整體主義的象限中，其中包含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與新葛蘭西馬克思主義(New-Grramscian Marxism)。世界體系理論具有顯著的整體主義傾向，然而強調生產關係而非生產力，因此淡化了物質主義色彩。另一方面，新-葛蘭西馬克思主義雖然與其他馬克思主義者更加重視意識型態的作用，但其物質主義的色彩仍然濃厚且深根。

在觀念—個體主義的象限中，自由主義為主要代表，但討論範疇包含新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強調國家內部因素對於國家利益形塑的作用，但是國家利益在獲取的過程中於國際體系層次受到國際制度的制約。新自由主義反而不強調權力與利益，而重視期望的作用。但兩派近年來在對待體系結構上趨同於個體主義，差異在於強調與重視權力、利益、制度，以及觀念的程度。

Wendt指出，在觀念—整體主義的象限中，不論是英國學派、世界社會學派、後現代主義，以及女性主義，皆視國際結構主要是透過共有知識所構成。比如，英國學派雖然沒有明確討論國家身分形成的問題，但英國學派認為國際體系是由共有規範所管理的社會。<sup>22</sup>另一方面，世界社會學派則是討論全球文化在國家建構過程中的作用。國際關係的後現代主義是首先將現代社會學中的建構理論帶入國際關係領域的，如同先前所述，為主流學派所提倡的物質主義與理性主義之最強烈的批判者。而國際關係的女性主義則認為國家認同是由國家和國際層次上性別結構所建構而

---

<sup>22</sup> Hedley Bull, 1977, *The Anarchical Socie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成。

整體來看，Wendt 想於二元對立的學派間建立橋梁使其能溝通，但其中隱含的意義可能是防止學派間越來越分歧，各有各的專利系統方法，比方說，方法本身並非一定是依附在某個學派，如果照 Wendt 所警惕的，系統理論或國家中心主義成為新現實主義的專利，則不僅對學術界會造成創造發展上的損害，還可能演變成意識形態的反對模式。例如，國家中心主義是現實學派所使用的概念，而不一樣的學派或甚至對立的學派則因此反對使用國家中心主義的概念。但從現今的狀況看來，似乎要打破思維與理論長久互動以來的傳統仍有著一定的難度。

### 參、科學實在論

國際關係理論第三次辯論在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的極端分化下結束，兩者的不相容性似乎無法再進行對話。然而，Wendt 認為這種以知識論作為主軸的辯論並非國際關係學者首要關切的議題。Wendt 主張回歸至本體論，也就是「這個世界」是如何構成的，而非爭辯要如何去認識「這個世界」，也就是以極端分化的主觀或客觀。這種以本體論為核心的探討，正是 Wendt 所期望的，用來取代爭辯到過於分化的知識論之戰。<sup>23</sup>除了對本體論方面的重視，Wendt 使用科學實在論(scientific realism)，也是因為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的過於分化而無法對話所致。

Wendt 認為，即便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之間的爭論是如此對立，但雙方卻被同一個問題所困，也就是理論與現實的關係。實證主義者懷疑我們是否能知曉無法觀察的事物；而後實證主義者

---

<sup>23</sup> Wendt,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90.

懷疑我們是否能瞭解現實。而 Wendt 藉由科學實在論，再次回到對本體論探討與關注來處理這個問題，但 Wendt 也指出，這不代表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的途徑就要因此終結，它們仍可持續進行各自原先的事務。<sup>24</sup>

Wendt 整理多種說法提出科學實在論的三條原則：第一，世界是獨立於個體觀察者的心智(mind)與語言；第二、成熟的科學理論之特色是討論這個世界；第三，承接第二點，即便當這個世界不能直接觀察。簡而言之，若由認識論的觀點出發，Wendt 心目中的科學實在論是相互吸收，又或反對兩大陣營中的思維：實證的經驗主義（不可直接觀察者為非科學的）、後現代的主觀感知（自身意識決定外在一起）。但實際上，這是關於本體論的思維，因此 Wendt 認為，科學實在論是種以本體論為優先的科學哲學。

Wendt 認為所謂的科學實在論既是有科學性，又或承認自然物質狀態基礎的客觀世界，然而對不可直接觀察的事物（如結構，體系，甚至是重要的觀念因素）又能去討論。<sup>25</sup>例如，Wendt 主張，國家和國家體系雖然是不可觀察的，但卻是實在的與可知的。<sup>26</sup>經驗主義者認為，我們無法知道科學理論是否真的指涉不可觀察的事物，因為我們無法觀察這些事物。Wendt 認為經驗主義者的作法是把認識論放置於本體論之前，因而影響國際關係的研究。<sup>27</sup>

相對的，從後現代主義者的觀點來看，主要認為我們甚至無法知道可觀察的事物之實體是否真正存在於世界中。這種看法有別於經驗主義者，經驗主義者至少對這一點是抱持肯定態度，也就是，可觀察的事物真的存在於世界中。後現代主義者認為，這

---

<sup>24</sup> Wendt, *Ibid.*, pp. 91.

<sup>25</sup> Wendt, *Ibid.*, pp. 47-91.

<sup>26</sup> Wendt, *Ibid.*, pp. 48.

<sup>27</sup> Wendt, *Ibid.*, pp. 49.

是言語論述的結果，科學根本無法認識事物是如何運作。對後現代主義者而言，建構主義除了是本體論也是認識論，因為實際上就是理論建構了世界。<sup>28</sup>

另一方面，國際政治的科學實在論受到的另一個挑戰是，後實證主義者的知識論主張：即便科學可以探知自然，也無法探之社會。科學實在論假設客觀事物乃獨立於人而存在，因此主體和客體為分立的，而客觀事物可以透過科學來被發現。就此觀點而言，科學實在論和經驗主義是一樣的。對物質主義來說也不構成問題，因為物質主義認為社會與自然並沒有差異。但社會建構主義認為社會類別主要是由觀念所構成的，此種重視觀念的立場，也使得實證主義的起點在面對科學實在論的後續論述（即便當這個世界不能直接觀察，也能進行討論）造成一種難題。<sup>29</sup>

因此，社會建構主義所面對的難題是雙重的。第一，若社會類別由觀念所構成，則此種類別就無法獨立於人而存在。既然如此，那這個世界是獨立於個體觀察者的心智與語言的、世界是獨立於人而存在的說法，似乎是相互矛盾的。對後實證主義者而言，這是混淆了主客體之間的區別，科學實在論正是依賴這個區別而存在的。第二，如果理念主義為真，則觀念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建構，而非因果。對某些人而言，社會科學必須以全是與話語分析為主，亦即以理解代替解釋。<sup>30</sup>

整體而言，Wendt 提出科學實在論的用意，在於回歸本體論為核心的期許。在第三次辯論以認識論為核心的狀態下，在此處，與其將科學實在論放置在與其他認識論同位階，不如說 Wendt 藉

---

<sup>28</sup> Wendt, *Ibid.*, pp. 49.

<sup>29</sup> Wendt, *Ibid.*, pp. 49.

<sup>30</sup> Wendt, *Ibid.*, pp. 49-50.

由科學實在論說明了的其社會建構本體論的哲學思維。此外，所未遭遇的困難，實際上都是以認識論為主軸的對立思維，對Wendt本體論觀點的討論。

## 肆、Wendt 對國家的定義

Wendt在其著作中也討論和國家相關的要點。其一，國家是什麼。雖然國家是個內涵分歧的概括詞，並且國家許多特徵與社會相關，但Wendt卻認為國家是實存的行為者（可觀察的客觀事實），而國家互動時是以「國家－社會複合體」的一部分進行互動。<sup>31</sup>

其二，關於國家利益。這是身為行為者的國家之動機來源。雖然利益針對不同主體而言也將有所差異，是種相對的認知，但國家利益被Wendt定義為「國家－社會複合體」的客觀利益：物質生存，自主權，經濟福利(well-being)，集體自尊。這些本質上偏向自我的利益使國家具有競爭性，但不代表國家天生是自私的。比較特別的是，集體自尊這種非物質利益的出現，這將國家擬人化並且帶有非物質因素，甚至可能為此做出看似不理智的對外行為。

在討論國家為何中，Wendt認為各觀點的分歧不是國家由什麼組成，而是國家所指的客觀事實為何。其提到三種觀點，並且認為應該創造一個極簡的(minimalism)國家觀，認為國家擁有共同核心（特徵），並列出五點基本特徵，詳見表3-1。

---

<sup>31</sup> Wendt, *Ibid.*, pp. 193-245.

表3-1：國家擁有的特徵

三種觀點	國家理論	五點特徵分佈	
馬克思主義	結構理論	(1)有制度的法律秩序	(5)領土
韋伯學派	組織理論	(2)壟斷使用組織暴力正當性的組織 (3)有主權的組織	
多元主義	社會理論	(4)是一個社會	
Wendt使用Cox的「國家—社會複合體」		意指包含以上五點特徵→極簡國家觀	

資料來源：Alexander Wendt,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93-245.

關於這些特徵，Wendt認為，有制度的法律秩序可以帶給國家社會複合體基礎的穩定，並能賦予正當性。而就壟斷使用組織暴力的正當性而言，行使暴力的部門需處於團結一致且非競爭的關係。在主權方面，對內主權可分割，對外受各種外力影響，但主權還是讓國家有獨立性。至於國家乃為社會的說法，Wendt認為國家行為者獨立於社會，卻在內部特性與社會相關，且社會先於國家。最後，領土是構成國家的要素之一，一個容納以上特徵的空間領域。

Wendt認為國家利益除了Waltz所認為的唯一利益---生存之外，還有國家的自由(自主權)，保護國家的資源基礎(經濟福利)，受尊重的需求(集體自尊)。然而，與其將生存作為利益的一種，某種程度上，國家生存其實是追求其他利益的基礎。但這並非否定Wendt所提及的其他客觀利益，特別是對應現今國際社會，這些利益點是合理的。不過，當所處時空是容許一併追求其他利益時，



或許生存利益的重要性較不突顯。相反地，所處時空若有壓迫生存的情況，則生存就有可能成為最首要的利益。

另一方面，如同經濟福利中「福利」可能發生定義改變一樣，「己」也是。是故，國家會追求自我利益，而有自私傾向產生競爭甚至爭鬥，但不代表完全不能以合作來爭取利益，在兩方面（利益的定義與對受益方的定義）的定義可為變數的情況下，看似非自利或不只利己的行為將有出現的可能。

不論如何，Wendt 的社會建構主張，國家是一個團體自我(self group)，具備群體層面的認知能力。也就是說，國家雖然在擬人化上是有問題的，但是基於團體自我，則擁有與個體人類相對的群體層面認知能力。因此，國家也有形成認同與改變認同的可能性。

## 第二節 社會建構的三種文化

一般而言，國際政治研究常被分為三個不同的分析層次(level-of-analysis)，即國際層次(international level)、國內政治層次(domestic level)，以及個人層次(individual level)。但是，更為簡單明確的分類是，由上而下(top-down)，或者由下而上(bottom-up)，也就是系統到單元或單元至系統的分析。<sup>32</sup>而結構現實主義的分析層次常被歸為國際層次，主要是以整個國際無政府結構來進行分析解釋。換言之，結構現實主義的分析層次是屬於系統到單元的top-down。

依照 Kenneth Waltz 的說明，國際政治有三個特徵：國際政治處於無政府狀態、行為者皆有自助傾向、行為者的能力有差異。

---

<sup>32</sup> 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1991,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7-12.

而能力的不同則使得國際間出現單極、兩極或多極的國際體系，但卻未改變外在的國際無政府結構。<sup>33</sup>就以上的特徵而言，國際政治處於該結構的結果是，各行為者在環境中被迫以各種對內或對外的方式來增強國力，以保障自身安全無憂。

然而，社會建構主義認為，國際社會的外在結構是個可以導入至少三種文化（霍布斯、洛克、康德）的空殼（無政府）。社會建構卻也因為三種文化的內容有所出入，而造成需要切換主體的問題，也連帶導致分析層次與分析層次方向的更動。此外，Wendt 對其社會建構理論的定位雖為實證主義，並提出科學實存論來強調屬於實證主義陣營的立場，但就社會建構在強調觀念與互動這方面而言，反而具有主觀概念重於客觀物質的特質。不過，Wendt 卻以觀念並非無所不在(ideas not all the way down)來平衡這個被誤會的印象。<sup>34</sup>

Wendt 認為國際體系並非如同主流理論所主張的，國際體系乃由物質能力分配的結構所決定，應該是由能動者和結構相互建構而成。<sup>35</sup>依照該思維，檢視 Wendt 所主張的「無政府狀態正是國家所造成的」<sup>36</sup>。此處的無政府狀態指的不是 Wendt 後來指出的客觀事實，也就是空殼式的無政府。精確來說，這裡的無政府為新現實主義所提出，造成自救與權力政治的因。

以建構的角度來看，行為者與結構之間互動建構時，身為空殼的無政府不會只有一種結果。也就是說，自救與權力政治是行為者與結構之間建構後，對應其中一種相互認同形式的無政府狀

---

<sup>33</sup> 張亞中主編，2007，《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文化。頁 47。

<sup>34</sup> Wendt,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92-138.

<sup>35</sup> Alexander Wendt, 1987,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pp. 335-370.

<sup>36</sup> Alexander Wendt, 1992,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pp. 391-426.

態後，所產生的制度，並非無政府本身的實質特徵。不論如何，這顯示出 Wendt 對於目前無政府的想法，無政府是空殼，內容可以改變，擁有不同互動模式與思維的文化認同，也會產生相對應的相關制度或規範。

若回到 Wendt 的原點，社會建構的角色是物質與概念的中間橋樑。其本體論可說是概念取向(ideational)，但於認識論則堅持為實證主義，希望能將看似對立而不相容的本體論與認識論觀點做融合，藉由建立中間路線來說明實證主義（解釋/ explaining）與後實證主義（理解/ understanding）兩個傳統還有對話的空間，<sup>37</sup>並非無法對話。<sup>38</sup>因此，本文雖以社會建構來觀察兩岸關係，可針對目前的認同差異提出若干說明，但在研究途徑的立場上，卻有陷入需要不時轉換分析層次與對象的困境。

## 壹、Wendt 的國際無政府狀態

Wendt 曾對現實主義所提出的國際無政府狀態進行討論，他提到新-新辯論的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共享著理性主義的基礎，而理性選擇能引導並將行為者的認同與利益視為外部的假設，並聚焦在能動者的行為如何產生結果。因此導出理性主義能提供一個行為過程和制度的基礎：行為會改變，但認同和利益是不變的。

Wendt 還說明了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還共享一些假設，其中便有國際無政府狀態，而新現實認為無政府是自我救助體系，該自我救助的思維會導致無政府狀態，競爭的本性產生安全困境與集體行動的問題。自由主義在這方面也承認新現實的無

---

<sup>37</sup> 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1991,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44.

<sup>38</sup>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 1996,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49-175.

政府狀態因果，但其強調合作行為。Wendt 認為弱的自由主義承認無政府狀態的因果權力，並接受理性主義的限制，也就受困在現實主義所設的限制中；而強的自由主義則對此進行反省，試圖找到突破點。

Wendt 除了連結兩個傳統之外，主要挑戰新現實主張的外部無政府狀態結構會使國家採取自我救助的假設。並認為自助與權力政治和無政府狀態並沒有邏輯和因果關係，若有也只是過程而非結構。他認為自助和權力結構是制度而不是無政府狀態的必要特徵，因為無政府狀態是國家創造的。並且認同和利益在無政府狀態下轉變的三個方式為---主權國家的制度、合作的進展、將個人認同轉變為集體認同。

Wendt 駁斥新現實主義解釋競爭和自助的世界論點有三大步驟：證明自救和無政府狀態無關，透過顯示安全的自利概念不是無政府狀態的結構特性、國家的互動可能會產生自助和競爭的權力政治，而無政府狀態只是自由角色、藉由第一和第二象徵評定本體對不同的無政府狀態有何影響。

Wendt 認為自助是一種互為主體的結構，在自我救助的觀念認知下所產生的狀態並不是無政府狀態，而是無政府狀態下的一種可能形式。行為者透過集體的參與得到認同，而認同是心理對特定實體的依戀，是明確、社會建構的。認同是利益的基礎，行為者在形塑立場的過程中定義了自己的利益。因此，若社會發覺自己處於自助體系中，那是因習慣而成的，只要改變慣例就會改變建構體系互為本體的知識。

由圖 3-3 可知，國家間的互動、對彼此行動的反應能在一種循

環中漸漸建立認同，因此建立共同利益認同是可能的，即便處於無政府狀態，何況該狀態的自我救助情況是人造的，就有改變互動形式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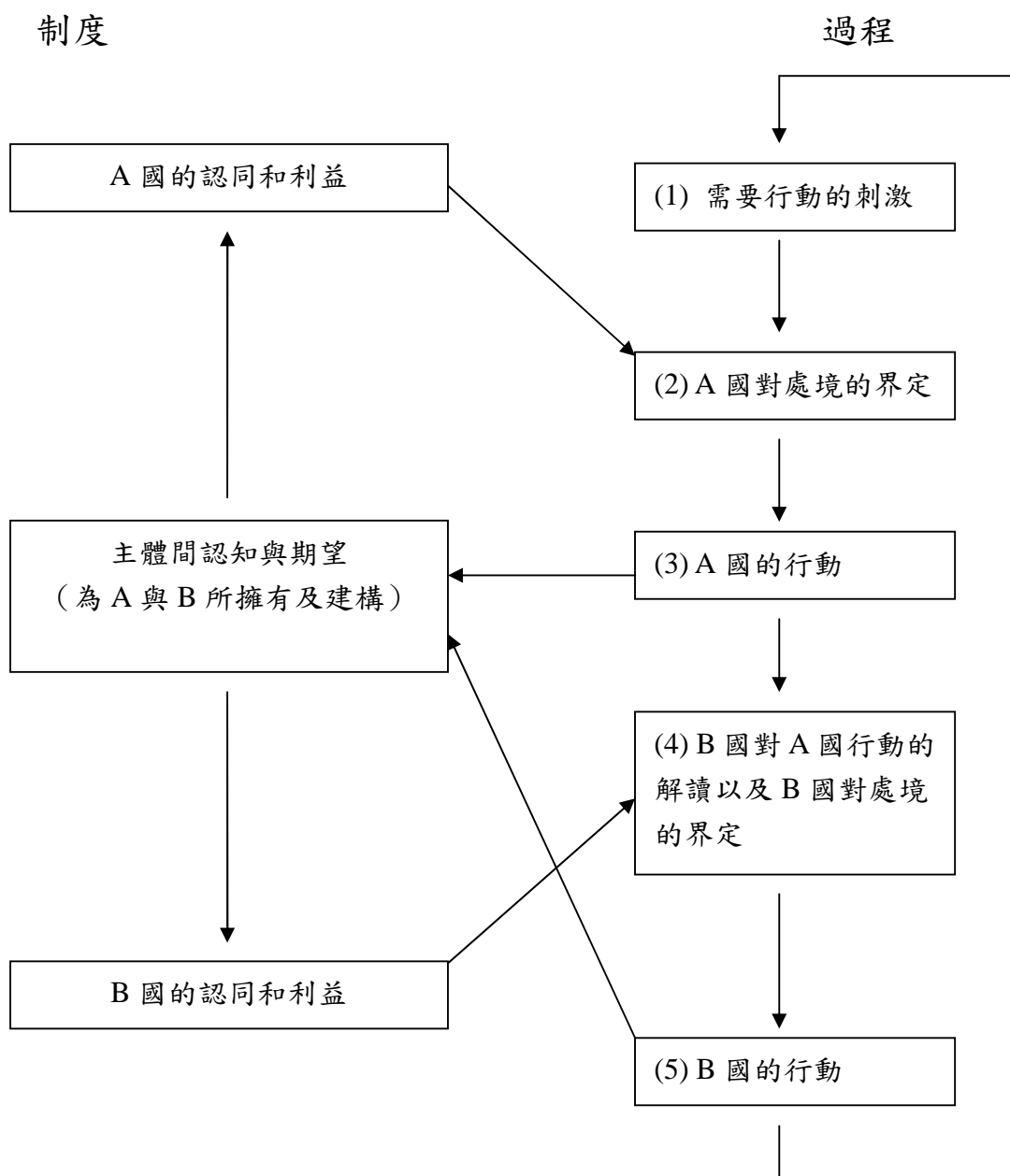


圖 3-3：文化、互動過程與國家實踐的關係圖

資料來源：Wendt, Alexander, 1992,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p. 406.

其實 Wendt 所提到的互動講道，認為能建立兩個研究傳統的橋梁，然而雙方因認識論上的差異而各執一詞，這也顯示出認識論的不同會使溝通產生問題，然而，一方面他也認為強的自由主義者與建構主義者能相互學到很多，前提是兩方能夠看透認識論的煙霧。Wendt 也提到社會科學不應該是受到古典物理學標準的影響，否則將掉入方法導向的陷阱中而不是問題導向的社會科學。這可能表示 Wendt 對認識論有著打破傳統觀念的意圖，雖然談論社會建構時要不斷切換本體與認識論，然而在某種程度上，受到這種本體、認識論準則支配的架構中，可能也將限制思維。

## 貳、社會建構與文化認同

Wendt 將常被認定為物質力量的權力與利益甚至制度，和其所提出第四種漸漸被提及的觀念作連結，他不認為權力與利益或制度是結構現實主義或新自由主義所言的單純物質主義之專門所有物，<sup>39</sup>三者並非純物質，並含有觀念的因素。他雖說明權力的意義與利益的內容在很大程度上由觀念所決定，但實際上，觀念並非全然影響在所有事物上，主導一切。因此，即便 Wendt 未曾明言也能得知，相反地，物質因素是影響事物的基礎背景。

Wendt 依照觀念建構利益；利益再建構權力的基本順序來進一步說明觀念與物質的關係。在利益建構權力方面，他指出結構現實主義的無政府為常數，權力為單純的物質力量組成，而常數下使權力分配成為主要討論的變數。首先是結構，結構現實主義的自助體系要成型需經由兩個過程—競爭與社會化，使結構間接影響國家行為者。但結構現實迴避社會化問題，主張社會化是關於概念，與其物質無關。不過，國家對無政府的共同理解卻是社會

---

<sup>39</sup> David A. Baldwin, 1993,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3-24.

化，而形成一種類似不言自明的規範或規則，進而才影響行為。

其次關於權力分配，常數下的各國重視相對利得而非絕對，這表示利益的獲取攸關權力增減，進而是安全問題。若利益為純粹物質，則權力分配的重點將轉向利益分配，並且利益與權力分配的關聯是沒有問題的，即利益是國家行為的動機。<sup>40</sup>然而利益總有文化背景，而國家猜測他國意圖是也常考慮到歷史因素，這使利益本身帶有概念因素的可能性產生。也就是說，常數下（視無政府為客觀存在事實），國際政治的權力分配之意義，大多由利益分配建構，而利益的定義則大多由觀念建構而來。<sup>41</sup>這表示此三層面的兩個關係擁有建構作用而非只有因果作用，也表達其挑戰純物質的論點並非基於完全概念因素的立場。

社會結構中總是包含觀念，利益以及物質，而物質主義與理念主義對這三種因素的個別重視部分即為區別的分歧點，但相互承認對方在一定程度上具備獨立的影響力。Wendt 將太過廣泛的「觀念」縮小範圍至「知識」，該知識指的是認定為真的信念。<sup>42</sup>知識又分成共有與自有，以國家為主體的層次來看，國家的自有知識常是產生於國內或意識形態等，這是影響國家評判外部情勢的關鍵因素，並在與他國往來時，自有知識將形成知識分配；<sup>43</sup>而Wendt 重視的社會性質之共有知識又可稱為文化，而所謂共有不只是共同也要相互關連（具社會意義的共有），此外，共有知識擁有合作和衝突的雙性質。

---

<sup>40</sup> 陳牧民，2009，《國際安全理論—權力、主權與威脅》。台北：五南。頁77。

<sup>41</sup> Wendt 並非反對因果關係，他認為除了因果關係之外，尚有建構關係。此外，藉由觀念-利益-權力的關係，說明概念影響物質的可能性。詳見 Wendt,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sup>42</sup> 這裡的知識特指自知為真的資訊，因此不包含人自知虛假的空想。詳見 Wendt,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sup>43</sup> 知識分配與權力分配對比，這種分配皆為各自掌握的不平均分佈，就知識分配而言，可以說是各自不同的觀點或價值資訊。詳見 Wendt,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因此，根據以上大致的定義與限定範圍之下，觀念等於知識；共有知識等於文化。Wendt 討論觀念結構的存在及作用，相對於提出物質結構的結構現實主義，提出了觀念分配的構成。並強調當代宏觀下被忽略的共同知識之影響力，主張目前國家間有很多共有知識，而國家也不得不去考慮這些事物，也就是說，當代國際體系中包含文化因素，因此他認為國關研究分歧主要是爭辯國際文化有多大影響力。<sup>44</sup>換句話說，對於國際文化影響國際關係的程度高低之看法，即為分歧點。

Wendt 認為行為者與結構的關係不只有因果，結構有因果與建構的作用。同理，文化（結構）或共有觀念除了因果的影響，還能建構行為意義甚至身分和利益，這也表示觀念能建構利益影響行為。文化建構能動者行為、身分和利益，在不同體系時，由於互為主體的背景不同，因此同一事物被建構的意義將不同。

Wendt 提出不同於過去結構現實的國際結構理論，討論無政府狀態的三種文化形式，認為無政府其實表示不存在單一既定邏輯，結構現實主義提到的無政府思維並非固定不變。另外，他說明所提出的結構並非一般物質結構，為「社會性」的，<sup>45</sup>該結構理論中，國際體系不只影響國家行為，也會影響國家的認同與利益，而結構與國家有建構關係。表 3-2 為兩類結構之大略區分。

---

<sup>44</sup> 以重視國際文化影響力與否形成分類光譜，簡而言之，就是回到物質或概念的爭辯。詳見 Wendt,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sup>45</sup> Wendt 所謂的社會性主要是有互動建構的關係，持有相同要件的行為體之間若無此種關係，則為無社會性。詳見 Wendt,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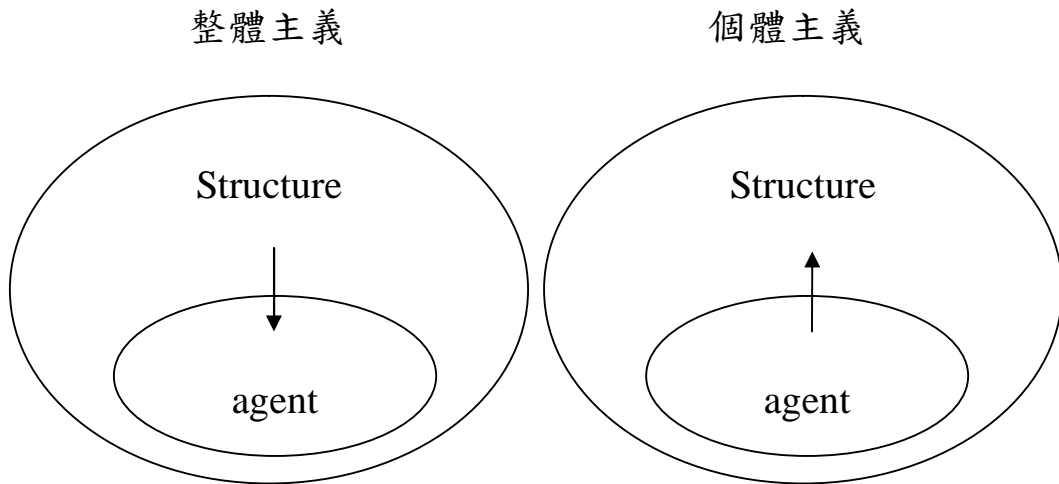
表 3-2：社會結構與物質結構的基本差異

結構區別	主要討論內容	結構與國家關係	結構影響國家內容
社會結構	社會結構之次結構---文化 →觀念分配	相互建構，雙向。	結構影響國家行為，還有國家的認同與利益。
物質結構	無政府結構下的變數 →權力分配	上到下，單向。	結構影響國家行為。

資料來源：Alexander Wendt,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92-138.

在前文中所題到的整體主義及個體主意的區分，其實也反映國際關係理論中的能動者與結構之間的議題，圖 3-4 為兩方的因果關係與建構關係。就因果關係來看，整體主義的因果關係是由結構影響能動者；相反地，個體主義的因果關係則是由能動者影響結構。這是因為，個體主義者認為結構是由有意識的個體所主觀決定的，而整體主義者則認為個體的行為受制於宏觀結構的影響。

## 其一 因果關係



## 其二 建構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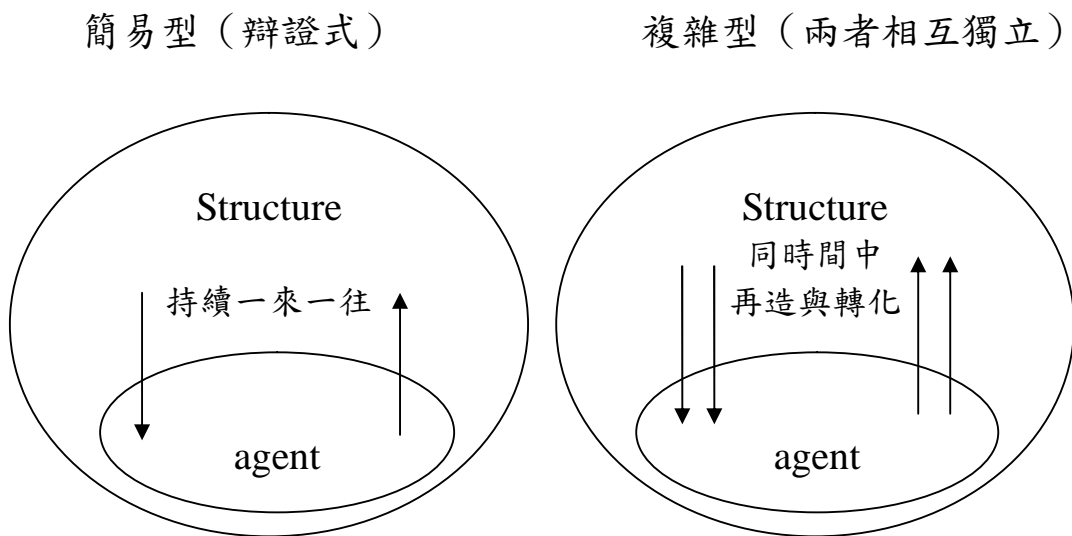


圖 3-4：能動者—結構之間的因果關係與建構關係

資料來源：Roy Bhasker, 1989, *The Possibility of Natu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pp. 32-36.

另一方面，就建構關係來看，圖 3-4 的簡易型是常見的辯證方式，有如雞生蛋，蛋生雞一般，除了用來說明建構與因果的關係差異，也說明結構與能動者對於彼此的建構，但是不足以說明結構與能動者雙方存在的獨立性。

因此，Wendt 採用複雜型的建構關係，其中的宏觀結構層次與微觀個體層次是分別獨立的，而且雙方之間存在對彼此的建構與重製、轉化關係。也就是說，宏觀的結構雖然對微觀的個體有所約束，但也同時受到微觀的個體對其的影響；相對地，微觀的個體雖然可能對宏觀的結構造成影響，卻同時也受到宏觀的結構的制約。

社會建構主義中的社會理論之首要原則是，行為者的行動是建立在「其他客體對於自身的意義」之基礎上。<sup>46</sup> 國家對待盟友與敵國的行為是不同的，因為敵國會威脅到自身，而朋友則不會。Wendt 認為，單以無政府狀態及能力分配是無法告訴我們，誰是朋友，誰是敵人。

先前所提到的權力的分配或許會影響到國家的考量，但是國家對於其他國家的認同，則有更多是依賴主體間的認識與期望，也就是知識的分配。<sup>47</sup> 這可以界定自身與他者。Wendt 認為行為者需要認同，而認同是行為者對於自身相對穩定的角色，所採取的特殊認識與期望，也就是主體間認識。由於行為者利益的基礎為認同，因此行為者在定義其處境的過程中，也界定其利益。<sup>48</sup>

Wendt 提出認同將會決定國家利益，說明認同具備多樣性，並

---

<sup>46</sup> Wendt, 1992,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op. cit.*, pp. 396-397.

<sup>47</sup> Wendt, 1992, *Ibid.*, pp. 397.

<sup>48</sup> Wendt, 1992, *Ibid.*, pp. 398.

非像新現實主義所界定的一樣（國際體系中的國家具有同質性，其認同是固定且想同的）不會改變。Wendt 的社會建構提出國家認同可以從四個面向討論，分別為：法人(corporate)認同、類屬(type)認同、角色(role)認同、集體(collective)認同。<sup>49</sup>

在法人認同中（也是其他類型的認同之出發點），群體層面的認知能力，讓國家經由建立與他者之間的差異，建構出獨立於他者的認同。例如，美國是有別於中國的國家。而類屬認同則有關於國家的形式或者政權的類型，例如，共產國家、民主國家。因此法人認同與類屬認同都是以內在因素所決定。

然而角色認同卻否，角色認同是由自身與他者之間的關係而決定，自身與他者之間的互賴程度或者關係緊密程度也會影響一個國家的角色身分。這種認同依賴共有期望，並非單方面的內在因素所致。例如，南韓想放棄是北韓的敵人這種身分，是無法單靠自身來決定的，因為北韓仍視南韓為敵人，反之亦然。而集體認同是角色和類屬認同的融合，行為者將他者的利益界定為自身利益的一部分。例如，美國是自由民主國家的一員。

此外，Wendt 提出，國家認同的產生可來自於兩方面，一為自然選擇，一為文化選擇。<sup>50</sup>自然選擇是行為者為了適應環境的競爭自我再造，目的可以是為了生存。不過目前的國際環境並非處於以霍布斯文化 kill or be killed 的邏輯中，因此，產生國家認同的文化選擇就變得重要。文化選擇是經由社會學習、模仿或者其他類似的過程，將決定行為的因素由行為者傳至其他行為者，這表示過程對國際社會的建構有重大意義。<sup>51</sup>

---

<sup>49</sup> Wendt,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224-233.

<sup>50</sup> Wendt, 1999, *Ibid.*, pp. 318-355.

<sup>51</sup> Wendt, 1999, *Ibid.*, pp. 324-355.

文化選擇有模仿和社會學習兩種方式，當行為者意識到其所認為是成功的行為者時，便會展開模仿。成功的標準是被共同理解所建構的，而共有理解是依文化環境與時空背景而發生變化。例如，文化環境處在春秋戰國時代時，在邏輯思維上，征服者的行為是被認為無誤的，甚至是光榮與道德的行為。然而在當今，那些為了壯大自身，統一他者的爭戰，或者毀滅他國的行為卻會遭到指責，並被認為是不道德的行為。

### 參、至少三種的文化認同

Wendt 將無政府狀態作為等待填入文化的空殼，並設定三個內化的程度。三個內化層次約略分為：受到力量驅使，不得不從—被迫（武力）；為了追求利益而行動—主動（代價）；感知規範制度的正當性而服從—觀念（建構）。而主要的三個文化認同為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以及康德文化。

而此三個文化為 Wendt 所區分，但他表示這是「至少」擁有的三種，因此，尚有其他文化的可能並沒有被否定。不過，這三個文化的階層高低的性質雖然明顯，但並沒有一定的發展方向。

本文將著重運用三個文化對角色認同的差異性、三者內化程度上的邏輯，以及互動基礎準則的部分，來說明不同行為者或行為體，對兩岸關係的認同差異與可能的影響。三種文化的簡略說明如表 3-3。

表 3-3：Wendt 三個文化簡略說明

文化	角色認同	制度/規範/規則	邏輯
霍布斯	敵人	戰爭	kill or be killed
洛克	競爭對手	主權	live and let live
康德	友人	非暴力與互助	security “team”

資料來源：Alexander Wendt,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46-318.

單就三種文化來討論，在國際社會無政府為霍布斯文化時，由於處於戰爭背景中，受到結構壓迫，產生的邏輯是消滅對方的存在或被消滅，<sup>52</sup>因此行為者之間的角色認同是敵人，自身的生存是最重要的。目前的國際社會在客觀上或許是以洛克文化為主，但如果宏觀中（國際社會）的客觀狀態排除，只以目前行為體的主觀認同而言，所謂霍布斯文化中的敵對關係，比較廣義的理解應該導入主權，也就是說，邏輯是消滅主權或主權被消滅。

或許霍布斯文化令人聯想到現實主義（戰爭、生存安全、權力極大化、追求相對軍事力量確保不受威脅等），但 Wendt 卻表示沒有必然的連結性，也就是在內容的重疊性僅供參考，並不代表霍布斯文化完全等於現實主義。不論如何，Wendt 也是點到為止，沒再說明霍布斯文化與現實主義的關係。<sup>53</sup>

若無政府為洛克文化時，對主權的重視則成為主軸，<sup>54</sup>邏輯為

<sup>52</sup> Wendt, 1999 *Ibid.*, pp. 259-278.

<sup>53</sup> 有關霍布斯文化與現實主義者的關係，或許在內容重疊程度不低，然而 Wendt 提出的三種文化，包含霍布斯文化在內，卻還存在內化程度的差異。詳見 Wendt,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sup>54</sup> 詳見 Wendt, 1999, *Ibid.*, pp. 279-296.

不消滅對方的共存，即便發生戰爭，目的只是為了改變現況，而不會消滅對手。在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上有平衡點，由於有共存獲利的概念，視彼此為競爭對手，既競爭卻也合作。一般來說，維持現狀是常見的，並透過其他規範秩序來維持秩序，因為如此一來能夠確保自身的利益。不論如何，其中的一些觀點與新自由主義是重疊的。

當無政府為康德文化時，非暴力與互助被正當地規範化，並有共同安全的邏輯，<sup>55</sup>彼此之間的角色認定自然成為盟友。不過在康德文化中卻產生一些問題，其不同於前兩者之處為，霍布斯文化與洛克文化在宏觀與整體層面的主體都是國家，但換到康德文化時，其描述的主體卻是人，這對於原本使用上需要轉換不同文化的社會建構，又增加一道使用上的難度。此外，現今的全世界並非，也沒有真正形成共同安全體的狀態，因而是一種過於理想的認同文化。

即便 Wendt 說明社會結構的觀念分配，且三種文化有層次關係，但卻表示未來走向是非指向性的（不一定是只朝向和平美好的未來），但不太可能倒退。<sup>56</sup>也就是說，發展上不一定是霍布斯—洛克—康德，並存在回朔的可能性。

不論如何，其實霍布斯文化一直是基礎的情況下，加上現階段國際大致上處於洛克的背景中，要倒退可能需出現軍事武力絕對強勢的超強權，並且其有意將全球攻佔消滅他國。總之，在 Wendt 的眼中，觀念的演變是漫長漸進的。

而本文在運用文化認同時，則以不同層次（國際與國內）中，

---

<sup>55</sup> 詳見 Wendt, 1999, *Ibid.*, pp. 297-308.

<sup>56</sup> 詳見 Wendt, 1999, *Ibid.*, pp. 308-312.

不同的行為體對於「兩岸關係」此一環境處於何種文化狀態展開討論。各自的認同也可以是各自所希望達成或維持的狀態，但不必然就是如此。表 3-4 為三個文化國際體系的比較，其中對應空間指的是國際社會中的一個部份，而非指全體國際的狀態皆處於該種文化。比如，康德文化的狀態至今未曾出現在國際社會中，但不代表當代國際社會不包含與康德文化相對應的「空間」。

表 3-4：三種國際體系的比較

	霍布斯文化式國際體系	洛克文化式國際體系	康德文化式國際體系
角色結構	互為敵人	互為競爭者	互為朋友
角色對外交政策的影響	互不信任，以最糟情況設想決策。暴力不受限制。國家採取強烈改變現狀方式對待敵人，例如侵略或摧毀他國。是相對軍事力量為最重要因素，相對的力量對比至關重要。	無論衝突的性質為何，國家間相互維持現狀，尊重他國主權。安全獲得基本保障，不再是最首要考慮。決策的絕對收益考慮增強。相對軍事力量仍然重要，但其意義發生變化，盟友間較易相互信任。會限制彼此的暴力行為。	不使用戰爭或威脅使用戰爭來解決國家爭端。國家之間進行安全互助，集體安全體系。
體系的邏輯	無止境的戰爭	無政府狀態使	安全社群。安



	<p>迫使國家安全至上，國家運用一切手段進行自保，形成一個自助體系，所以安全或是國家生存成為一種零合關係。</p>	<p>得國家追求安全而非尋求權力，形成主權制度，造成權力平衡。</p>	<p>全社群內彼此確信不以武力解決爭端，運用談判及仲裁鞏固安全。對外採行集體安全策略</p>
體系的趨勢	<p>長年不斷的無限戰爭。不適合體系之弱小國家滅亡。未被消滅國家進行權力平衡。國家難以採行不結盟或是中立。</p>	<p>戰爭被接受亦受到約制。體系內國家成員相對穩定。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弱小國家未被滅亡。國家相互承認主權，造成權力平衡體系。中立及不結盟受到認可。</p>	<p>非暴力解決彼此爭端。相互援助反抗第三者的侵略。</p>
國家間的共有知識	<p>對手也是國家。其他國家都是敵人，都威脅著本國的生存。如何對付敵人、如何發動戰爭、如何傳達威脅訊息、如何安排投降，以及如何達成權力平</p>	<p>主權制度。國家間互為競爭對手。</p>	<p>國家間免於暴力及得到安全援助。</p>

	衡。		
對應的歷史時間	早期的國家體系。	1648 年後西伐利亞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西歐。
對應的空間	古代各種區域性的國家體系，例如春秋戰國。	近代歐洲和當代的全球。	北約組織。
對應的理論	現實主義。	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	民主和平論。

資料來源：張亞中主編，2007，《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文化。頁 101。原始來源：Alexander Wendt,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46-316

整體而言，國際體系的轉換並非單純物質力量的改變所能導致，而是能藉由行為者之間的互動與實踐，轉變原有的國家認同，進而形成新的國家認同與利益，然後再形成新的國際體系。

## 第四章 兩岸關係的認同差異

如同先前在研究動機所述，就現實學派而言，兩岸關係自美國介入後，並未發生重大變化。中國與台灣的軍事落差等物質實力不均依然一樣，且美國仍是兩岸權力平衡背後的關鍵角色。以社會建構來看，自中國走入國際社會（主要是洛克文化）後，兩岸關係也由衝突模式轉換為穩定發展模式。然而，其背後卻存在難以解決的認同差異問題。認同問題又分別發生在兩個層次，一為國際層次，一為國內層次（台灣內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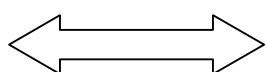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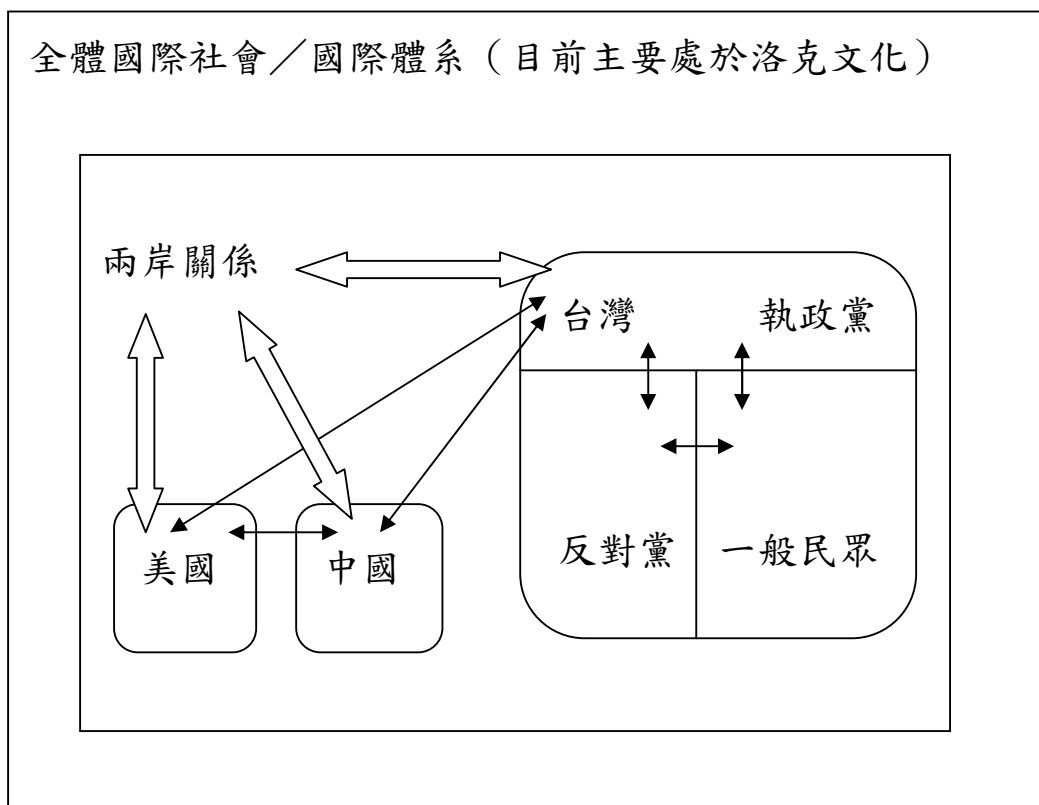
將下來將運用 Wendt 社會建構主義的觀點，諸如「國際社會的外在結構是個可以導入至少三種文化（霍布斯、洛克、康德）的空殼（無政府）」等概念，來探討兩岸關係的認同差異。例如，兩岸關係在過去，由於冷戰圍堵與國共內戰等因素影響，不論由美國、中國，還是台灣來看待兩岸關係，基本上都認定兩岸關係是處在危險的霍布斯文化。而在 2000 年之後的兩岸關係，於認同方面也產生不一樣的互動狀態。

值得一提的是，只有三種文化之中，只有康德文化不會有戰爭。而洛克文化中則還是會產生戰爭，但其目的是為了改變現況，迫使對方改變行動模式，而非消滅對方，使對方於國際社會不復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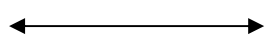
另外，正如先前探討 Wendt 的社會建構時所得到的答案一樣，遇到認同差異時，並沒有所謂的誰對誰錯，重點在於為何與如何變化。一般而言，與他者相關的認同是帶有期望的，當雙方達成共識、形成共有意識之後，才能穩定自身對於他者的角色認同，以及他者對於自身的角色認同。

此外，本文運用社會建構時，大致有幾項要點：第一，以不同層次（國際與國內）中，不同的行為體對於「兩岸關係」此一環境處於何種文化狀態展開討論；第二，各自的認同也可以是各自所希望達成或維護的目標，換言之，也是各自的態度立場，但不必然都是如此。第三，目前整體國際社會應是處於洛克文化。但本文中，環境則聚焦在兩岸關係。而討論的主要國家則仍是美國、中國、台灣。第四、國內層次中，不同的意見群體除了根據三種文化認同分類，依照立場光譜的分類可分為：執政黨、反對黨，以及一般民眾。第五、認同發生變化至少有兩種狀況，其一是本身自我即可確立的認同變化，另一種則是受制於他者才能真正確立的認同變換。

總之，如圖 4-1 所示，兩岸關係的認同差異產生在國際層次與國內層次，同一層次間的行為者又有部分相互是受制於他者認同因素的情況。另外也如前述，當代的國際社會或國際體系主要以洛克文化為主，而本文的研究環境聚焦在兩岸關係。



結構與能動者之間同時進行再造與轉化



同階層行為者之間的互動影響（有關他者的認同所致）

圖 4-1：兩岸關係認同差異的雙層次

說明：其中全體國際社會或稱國際體系，在當代主要處於洛克文化，在這個背景因素之下，特別在國家行為者方面，將受到影響。其關係即為前述的結構與能動者之間，同時進行再造與轉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 第一節 國際層次

兩岸關係就結構現實的觀點來看，其權力分配是極度不均等的，台灣與中國的不平衡之所以維持，是因為外部有美國作為平

衡的關鍵角色，而台灣的穩定也幾乎取決於兩國實力的消長，<sup>57</sup>並受困於這種環境而難以脫身。<sup>58</sup>基本上，在兩岸關係方面若只看美中台三方的話，以台灣的實力而言，其實很難造成重大的影響，實際的狀態維持仍然由兩大國所掌握。

然而，若觀察觀念方面的轉變，台灣自身的影響力卻不能與純粹物質實力時的考量相提並論。當考量觀念方面時，台灣卻是能發揮一定程度的影響力。這也是為何要以非純物質的觀點來討論兩岸關係的原因之一。此外，在純物質的考量中，兩岸關係似乎也沒有太多重大的變化。但以社會建構來看，兩岸關係的變化卻是時時刻刻在進行著。

若運用社會建構，以國際層次的文化認同而言，兩岸關係在過去，由於冷戰圍堵與國共內戰等因素影響，不論由美國、中國，還是台灣來看待兩岸關係，基本上都認定兩岸關係是處在危險的霍布斯文化。但自從中國改革開放、兩岸展開意見交流，整體觀念就逐漸開始改變，或至少從策略轉變上能觀察到。<sup>59</sup>

在 2000 年至 2008 年之間，兩岸關係一度又緊張起來，由於這段期間內，台灣的兩岸關係方針，在高階政治與宣傳上明顯以排斥中國，以敵對的認同為主，雙方對於敵我的認同也受制於他者因素，使得台灣和中國的關係常處於緊張狀態，難以找出溝通的空間。中國即便想放棄對台灣的敵對認同，或者是台灣所給予的敵國角色之認同，卻會受制於台灣看待中國是敵人的認同而無法成立。相對而言，台灣也是如此，想放棄需經他者所確立的認同是無法依靠自身決定的。這一點其實在建立新的角色認同時也

---

<sup>57</sup> Kurt Campbell and Derek Mitchell, 2001, "Crisis in the Taiwan Strait,"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4, pp. 14-25.

<sup>58</sup> Michael Swaine, 2004, "Trouble in Taiwan," *Foreign Affairs*, Vol. 83, No. 2, pp. 39-49.

<sup>59</sup> 翁明賢主編，2007，《新戰略論》。台北：五南。頁 379-383。

是一樣的狀態。

觀察 2008 年與其後的兩岸關係，台灣所跨出的一步是外交休兵、兩岸和平發展；中國所做的回應是胡六點的兩岸方針；美國則表示，樂見兩岸發展和平關係。乍看之下，兩岸關係似乎在整體上已經脫離霍布斯文化了，但其實美國、中國，與台灣，三方對兩岸關係反而抱持各自不一的認同，也與三方所希冀達成或維持的目標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質存在。

## 壹、美國對兩岸關係的認同

就美國方面，除最初的歷史因素之外，為了其自身利益，不論是 2000 年至 2008 年之間，或是 2008 之後，仍然認為兩岸維持現狀是最好的。美國一方面需要與崛起的中國交流往來，一方面也需要一些控制力足夠的籌碼。<sup>60</sup>對美國而言，兩岸關係比其他兩者來說，應是更為單純的狀態，因為利益的成分以物質性的居多。美國對於兩岸維持現況的需求並不像中國的兩岸統一是訴諸民族情感性質的，也不像台灣常處在急於從各方面找到突破口的焦慮狀態。

美國與兩岸雙方的雙邊關係皆很重要，一方面，中國可以提供美國經貿的利益，也能在國際政治上付出或協力；另一方面，台灣可以作為面對中國不穩定因素與可能威脅的前線，也能成為與中國交流時的籌碼，甚至軍備購買、介入東亞事務的據點之一等，台灣與美國的關係幾乎是政治上的附屬國。因此，美國在兩岸關係的認同上是最穩定一致的。觀念建構利益，再建構權力，當美國所認定的國家利益不變時，其對兩岸關係維持安定現況的

---

<sup>60</sup> 王高成主編，2009，《當代戰略思想之省思與前瞻》。台北：時英出版。頁 279-311。

期許也不會有所改變。

以社會建構而言，美國的歐巴馬政府對於兩岸目前外交休兵與務實和平發展的兩岸關係表以支持，並樂見其成。這意謂美國至少到目前為止（或許時間點更早），開始認為兩岸關係已經是洛克文化的狀態（如同目前國際間的主要的文化認同），而不再是消滅對方的霍布斯文化。美國觀念的轉變，同時可能來自於是近年來中國對於國際的貢獻與表現，實例有如六方會談，<sup>61</sup>或者轉變南海爭議為合作途徑，<sup>62</sup>甚至在美國金融危機後，<sup>63</sup>又更加強化中國逐漸融入洛克文化（目前國際社會的文化階段）的想法。因此，融入洛克文化的中國與台灣所產生的兩岸關係，自然處於洛克文化的狀態。

另一方面，在自然狀態沒有處於霍布斯文化那種險惡狀態時，國家認同的形成使以文化選擇為主，也就是說，以模仿成功的行為者為主，或者說這個成功的案例是由多數所共同理解的。因此，當整體國際社會或國際體系主要是洛克文化之時，就有很強的吸引力。而美國正是處於洛克文化的主要國家，因此比照洛克文化所學習到的經驗，對兩岸關係也很可能抱持性質差異不大的認同模式。也就是說，即便要配合中國對一中的堅定論述，甚至配合中國所認為的「兩岸問題是內政問題」的觀點，美國還是以維持一個雙方都是各自為政的兩岸關係。

---

<sup>61</sup> Peter Van Ness, 2005, "Why the six Party Talks Should Succeed," *Asian Perspective*, Vol. 29, No. 2, pp. 231-246.

<sup>62</sup> David Shambaugh, 2005,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3, pp. 64-95.

<sup>63</sup> 中國在近年來積極參與國際，除了朝核六方會談（中國開始適應多邊協商），尚有索馬利亞海盜事件的合作護航行動、檢討美國金融危機的準主導立場與改革態度等。



## 貳、中國對兩岸關係的認同

中國方面，於 2008 年年底胡錦濤發表胡六點時，也再次界定兩岸關係，認為自 1949 年以來，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世紀 40 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但這沒有改變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sup>64</sup>也就是說，中國認為兩岸根本沒有分裂成兩個獨立的國家，這是內部問題，而現在是中共代表中國主權，台灣的政權是非主權，或者已經被取代的歷史朝代之一，又或是一個內部政治混亂下的遺物。而今後要將兩岸統一，如同補足曾失去的物件一般。中國還運用多種手段來正名和切割與美國友好的盟國力量，試圖讓美國介入亞太的力量減少。<sup>65</sup>其中原因也包含保障自身在區域中的地位影響力，在兩岸議題上能保有優勢。

不論這是不是口號，以往一中各表的共識存在感越來越薄弱，中共似乎認為，所謂中國，是受到國際承認的中國，也就是現今其本身。兩岸沒有分裂，只是政治對立，是哪一方獲得中國政權與代表權的問題，因此統一更不是二合一或創新。因此，一中框架的前提下，使得中國種種的善意總是帶有不懷好意的陰影。對於胡錦濤的發言，看清其思維概念後，不難發現言論中還是有兩岸本為一體的一中論堅持，並且中國對台政策的堅持，在政治層面必然是統一，也不會改變的（至少就目前所釋出的訊息來看）。

因此，不論中國的手段由文攻武嚇轉變為文化經貿交流，中

---

<sup>64</sup> 胡錦濤在演說中表示，兩岸統一是內部問題，並且不是主權和領土再造，而是結束過去以來的政治對立。詳見胡錦濤，2008 年 12 月 31 日，〈「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30 周年座談會演講稿〉，<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18824/2008/12/31/2225s2379738.htm>。

<sup>65</sup> Ian Bostock, 2005, "US Alliance Disturbs Australian-China Clam," *Jane's Defense Weekly*, Vol. 42, No. 11, p. 15.

國對台的最終目的還是沒有改變，仍然以消滅主權為主，<sup>66</sup>甚至從某一刻開始不認為，也不承認台灣是有主權的政治實體（自中共代表中國主權後就沒有存在過）。這些態度也讓人不得不再次質疑，中國和平崛起的可信度。不論如何，這表示中國本質上仍以消滅對方的邏輯態度，看待兩岸關係。

以社會建構的認同來看，中國目前的狀態其實很特殊。中國的訴求與目標是霍布斯性質的，然而在與台灣互動上的方式卻轉為類似洛克文化的態度，某種程度可謂表裡不一致，甚至在台灣近年來提出外交休兵等和平互動的方針後，常會給予類似康德文化的回應（若先不論中國所堅持的一中框架原則的話），例如在ECFA提出會讓利給台灣。<sup>67</sup>

但上述的洛克文化之由來可能與學習模仿有關，也就是說，因為目前整體國際間為洛克文化，在踏入整體國際這片認同區之後，中國也擁有了共同理解，學習模仿洛克文化的性質。但在兩岸關係方面，中國不能承認兩岸是國與國的互動，也因此有了這種折衷的互動模式，也就是目的是霍布斯文化、手段是洛克文化、甚至態度常會展現康德文化。

另一方面，中國目前對兩岸關係的特殊狀態也同時受到美國與台灣的認同所影響，當中國界定其目標為霍布斯之時，這是不需要他者來確立的，然而在互動過程中，中國不得不改變霍布斯的認同方式，因為美國與台灣皆不希望兩岸處於霍布斯文化的狀態。中國順理成章形成一種省成本但較不迅速，卻符合目前國際規範的統戰行為模式。比起主權與軍事實力等高階政治，反而運

---

<sup>66</sup> Avery Goldstein, 2001, "The Diplomatic act of China's Grand Strategy: A Rising Power's Emerging Choice," *China Quarterly*, No. 168, pp. 861-863.

<sup>67</sup>

用低階政治的經濟途徑做為手段以達目的，也就是說，透過非軍事與非物質的手段，以長期追求國家在平時的利益。<sup>68</sup>

## 參、台灣對兩岸關係的認同

台灣方面，以社會建構而言，台灣官方在觀念上的改變，很明顯由 2000 年至 2008 年之間的敵對認同，轉變為新的認同態度。如同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於國會所言，「中國不是敵國」。就「中國不是敵國」的言論來分析，所謂不是敵國即表示沒有進攻的意圖，也就是沒有敵意，因此在沒有戰爭可能性的情況下，應該歸類在康德文化。當蘇起於國會備詢發表言論後，在場的其他官員並沒有表示異議，再加上，以當時蘇起的身分地位來看，其所發表的意見，在可信的程度上，實為忠實地反映總統的思維。

另一方面，過去共同的歷史文明背景，以及對 2000 年至 2008 年之間台灣兩岸政策方針的修正或反動，也能成為康德文化關係的發展契機之一。某種程度而言，這種認同的轉變，也是能動者與結構之間的再造與轉化，也是一種模仿成功行為者的學習所致。<sup>69</sup>也就是說，當先前的認同在面對結構與他者產生不利的情況後，台灣便自動重新檢視兩岸方針，企圖轉變原先的霍布斯狀態，因為，認同所建構的國家利益並不希望兩岸是處於霍布斯文化。

此外，這種認同所建構的國家利益，與整體國際處於洛克也有所關聯，當洛克文化成為一種共有理解，且擁有正當性，則行為者模仿學習之後，洛克文化的相關訴求也相應會成為基本價值觀。換而言之，就是對主權的重視，相互尊重與維持並存現況。<sup>70</sup>

<sup>68</sup> 王高成主編，2009，《當代戰略思想之省思與前瞻》。台北：時英出版。頁 39-42。

<sup>69</sup> Roy Bhasker, 1989, *The Possibility of Natu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pp. 32-36.

<sup>70</sup> Wendt,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246-316.

然而以台灣的狀況來看，過去的洛克文化似乎也沒有太多進展，因此這次轉變為康德文化作為兩岸方針進行互動，並非不能理解的行為。

## 肆、國際層次的認同差異

整體而言，將國際社會的焦點擺在兩岸關係，綜觀兩岸關係在國際層次的文化認同差異，以美國，中國，以及台灣，三方的觀點來看，三方對兩岸關係的文化認同上其實是不同的（參見圖4-2），主要是看三方所期待目標為主所進行的區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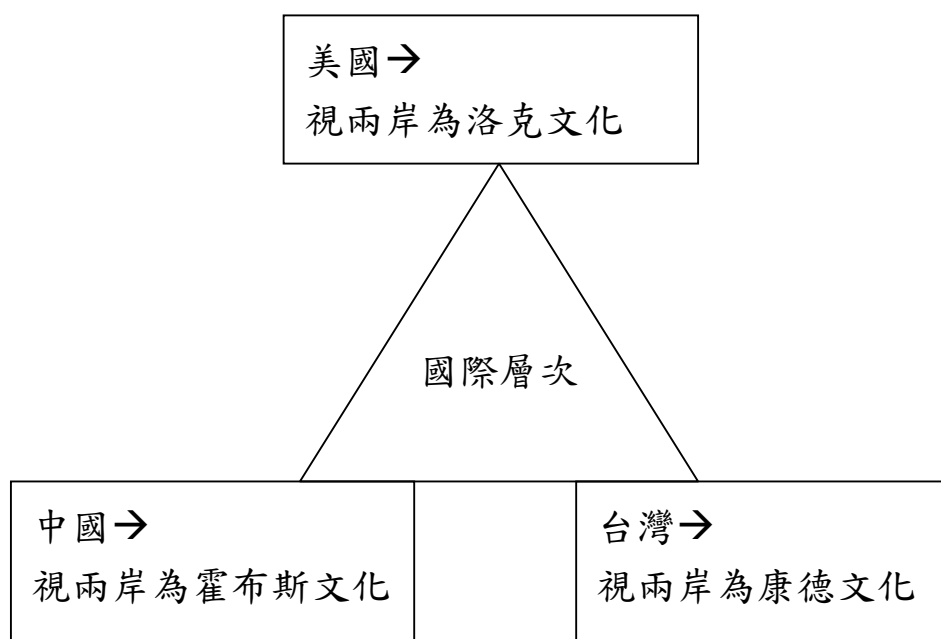


圖 4-2：兩岸關係認同差異－國際層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美國雖然常認為兩岸具潛在衝突危險性，至少在過去的歷史確如此，也特別突顯，但近來經過兩岸互動表現的逐漸改變，已認為是相互競爭共存的洛克文化，加上美國的目的與其認同幾乎

一致，因此又更加強化美國是兩岸為洛克文化的觀點。

中國近來也算已經釋出善意，並且互動關係逐漸熱絡，但由於堅決的「一中」政策，甚至常刻意忽略「各表」，諸如《反分裂國家法》，<sup>71</sup>或是堅持一中框架為未來互動的前提，仍企圖在最後消滅台灣主權形成一統，因此就目的而言還是霍布斯文化，但整體來看，目前互動的方式反而比較接近洛克文化，但態度上的康德文化卻明顯不夠真實，因為到目前為止，即便使用武力受到侷限，中國還是有可能，也有機會再次運用威脅使用武力來迫使台灣做出改變，如此一來便不符合康德文化。

然而，台灣認為兩岸互動發展將已使關係友好化，也有視兩岸為盟友關係的傾向，此外，執政黨的新三不政策雖具備維護主權現狀的條件（乍看之下會誤以為是洛克文化），<sup>72</sup>卻也包含反對武力、戰爭的意見。於此基礎上，台灣企圖讓兩岸產生安全互信且互助的關係，加上近來政策方針的實行，可見台灣對兩岸關係未來的目標是屬於康德文化。或者就現實面、退一步而言，未來就算難以達到康德文化的關係，但至少能確保在洛克文化的狀態，並避免霍布斯文化產生。

## 第二節 國內層次

### 壹、執政黨對兩岸關係的認同

除了在國際層次，美國、中國、台灣對於兩岸關係的認同都不相同之外，在台灣內部也有不同的文化認同。如同「中國不是

<sup>71</sup> 《反分裂國家法》全文參見國台辦網站資料，  
[http://www.gwytb.gov.cn/gzyw/gzyw1.asp?offset=150&gzyw\\_m\\_id=596](http://www.gwytb.gov.cn/gzyw/gzyw1.asp?offset=150&gzyw_m_id=596)。

<sup>72</sup> 馬英九於 2008 年 5 月 20 日總統就職演說所言：「我們將以最符合台灣主流民意的不統、不獨、不武的理念，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台灣海峽現狀。」詳見〈中華民國第 12 任總統就職演講稿〉，[http://www.rti.org.tw/big5/topic/2008/520/news\\_080520n.aspx](http://www.rti.org.tw/big5/topic/2008/520/news_080520n.aspx)。

敵國」的思維，現階段的執政黨與其執政團隊或支持者，他們可能認為與中國是處於康德文化，應以朋友的方式來互動。其它尚存在霍布斯文化、康德文化為主的意見群體。

在本文中，以「執政黨」代表這些以康德文化看待兩岸關係的意見群體，所以此處的執政黨不代表執政黨本身，所指的只是對於 2008 年政黨輪替之後的執政黨，所顯示出的康德文化認同有所共感的意見群體。(參見圖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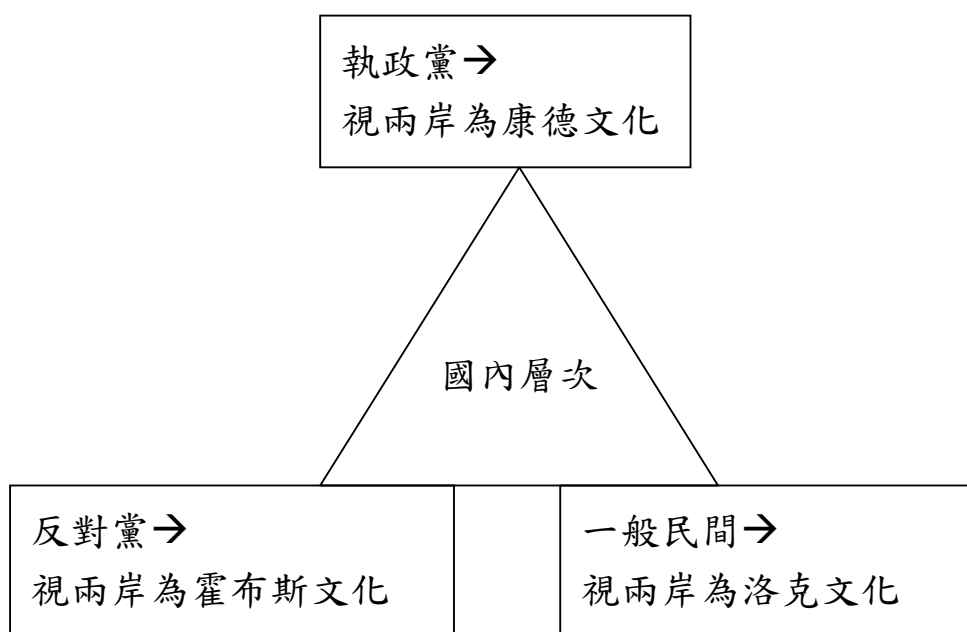


圖 4-3：兩岸關係認同差異－國內層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如同先前在國際層次所述的台灣部分，執政黨是接續與改變的開端。而執政黨很明顯是支持並看好「與中國做朋友」的意見群體，偏向理想主義，而在兩岸方針上，與中國做朋友也因此成為執政黨最佳化的目標。

## 貳、反對黨對兩岸關係的認同

相對於執政黨的則是在本文中被稱為反對黨的意見群體，同樣的，此處的反對黨不代表反對黨本身，所指的只是對於 2008 年政黨輪替之後的最大反對黨，其所提出的，對中國應有所警戒的觀點，有所共感的意見群體。

反對黨與其相關團體人士，對於執政黨的中國政策表示不滿。就社會建構的角度而言，反對黨與其支持者認為與中國的關係是處於霍布斯文化，必須處處小心提防，對中國的態度要不友善許多。比起早期台灣與中國所結下的霍布斯文化關係，若執政黨目前已經改觀為康德文化，則反對黨是保留那些認同，甚至在近幾年來受到中國的文攻武嚇，以及先前執政時期前後所受到的壓迫，都強化了這些以往就被灌輸的霍布斯文化認同。換而言之，反對黨強烈意識到或認為中國沒有放棄消滅自己國家的意見群體，面對中國一舉一動，一般都以現實學派的觀點看待。<sup>73</sup>

同樣是基於這些因素，反對黨人士與中國的協調空間被認為是不足的，即便現今中國經常釋出願意溝通的善意，比方說，ECFA 的經濟讓利，但在他們眼中，這些舉動均為糖衣毒藥。<sup>74</sup>然而，這不代表反對黨這個意見群體無法改變其認同，反對黨視中國為敵人的起因是，中國對台灣的不友善、外交抵制、主權壓迫等。當雙方皆是彼此為敵人時，角色認定就此成立，但是仍可經由再造轉化與模仿學習進行改變。例如，現況下，執政黨的互動模式若

---

<sup>73</sup> 執政黨與反對黨的態度差異，也可由 2010 年的雙英辯論得知。參見華視新聞網，2010 年 4 月 25 日，〈雙英辯論全文摘要〉，<http://news.cts.com.tw/cna/politics/201004/201004250458560.html>。而反對黨意見群體面對 ECFA 想法與態度也明顯異於執政黨意見群體。參見黃悅嬌，2010 年 6 月 28 日，〈綠堅持反 ECFA 咬定台灣開放一定越來越多〉，中時電子報，<http://news.chinatimes.com/politics/0,5244,130502x132010062800547,00.html>。

<sup>74</sup> 黃悅嬌，2010 年 6 月 25 日，〈反 ECFA 台聯：中國讓利 包糖衣毒藥〉，中時電子報，<http://news.chinatimes.com/politics/0,5244,130502x132010062500964,00.html>。

成為一種成功的案例，則反對黨則有可能對目前的狀態做出修正。

不過就基本目標而言，反對黨期望的是兩岸為洛克文化以上，只是受到敵對角色認定的約束難以脫身，因此時常處於霍布斯文化與洛克文化的界線。此處也顯示出，當層級低的認同文化遭遇層級高的認同文化時，層級高的認同文化不得不降低自身的層級，配合層級低的文化，以減低可能的風險所造成的損失。

若從現階段反對黨堅持一樣的認同來看，未來可能產生幾種變化，其中一種是就價值觀念與意識型態大於實質利益的考量而言，因此將會持續認定兩岸關係為霍布斯文化（但起因仍是中國想以一個中國的框架網綁台灣所致）；另一種從較為現實的實質利益衡量推論，若國家急需經濟利益，又要符合保有主權立場的狀態，反對黨可能將轉變成表面上的洛克或康德認同，也就是互動形式。實際上還是以霍布斯認同提防中國，如同對應中國在兩岸關係認同的特殊狀態一樣。

### 參、一般民間對兩岸關係的認同

最後，一般民間，在本文中代表的是那些主要認為兩岸之間實為兩個主權國家，目前既競爭又合作，此外，認為維持現狀即可，維持現狀也能符合多方多重的現存利益的意見群體。簡而言之，一般民間重視的是確保利益。

若將「執政黨」與「反對黨」的意見群體先去除，只討論中立選民或稱立場較為客觀中立的一般民眾，他們可能視中國為競爭的對象，以洛克文化的方式來認定兩岸關係。雖然他們不一定認為兩岸皆有主權，也不一定支持兩國論的說法，但清楚意識到兩岸是各自有其政治領域、互不相管的政治實體，並且能合作卻



也競爭，還有更多不同形式的衝突等待處理。

然而洛克文化，最糟的情況下還是會發生戰爭，只是相較過去而言，現況下的可能性很低。但不論如何，一般民間或許認為兩岸這種微妙狀態至少到現今仍然是持續的，而維持現況將是保障多重利益的好方式。從陸委會的長期民調中可看出，一般民間對兩岸關係多是以維持現狀為主，甚至永遠維持現況的比例持續上升。<sup>75</sup>

總而言之，台灣內部不論是哪一方，都有其所想達到的目標，不論是冀望的利益或概念上的立場。假設這種內部衝突是單純的物質利益衝突，則問題難易度低，比較好解決。然而，基於社會建構的角度來說，台灣的執政黨、反對黨，以及一般民間對於兩岸關係的認同卻是不同的，這種包含概念上的衝突卻不是一時半刻就能處理完成的。但可以確立的是，三方的目標中，都不希望兩岸關係是處於霍布斯文化的狀態。因此，兩岸關係不是霍布斯文化就變成三方所分享的共同利益之最低底線。

不論如何，執政黨與反對黨的認同差距，或許產生難以解套的對立，但是霍布斯文化是受制他者而成、以康德文化為主軸是一種跳躍式的政策方針。兩者作為主導政策走向的認同，都不太能配合一般民間的洛克文化認同，因此在實踐上與民眾的期望落差往往也很大，使得原先預期成果受限。

以一般民間的洛克文化認同而言，中國還是可能攻擊台灣，但只要兩岸關係維持穩定，戰爭可能性將大幅降低。而一般民間所尋求的正是在維持穩定的限度內，退一步能保障目前生活，進

---

<sup>75</sup>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9年12月，〈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民眾對兩岸關係的看法〉，<http://www.sef.org.tw/public/Attachment/01410152671.xls>。

一步讓台灣能獲得良好的競爭環境與地位。

### 第三節 認同差異的相互衝擊

由於兩岸關係的認同，不論是在國際層次或者國內層次，基於不同的主體皆有認同差異性，因而產生認同混亂的結構。這些不同層次中的各自行為者之間，與其結構接有建構關係存在，也就是說，同一層次間的行為者有部分是相互受制於他者認同因素的情況。

首先，在國內層次，三種類群間的認同互動是相互影響與牽制，執政黨與反對黨群體單就兩岸議題而言，在早期的認同上並沒有差異。但自現階段執政黨從過去開始與中國談判後，認同也逐漸轉變，而反對黨則保留舊式認同，因此在認同立場上就此分歧。

這也造成台灣在對立政黨分別執政時，產生分裂的兩岸政策，使得台灣於兩岸面向的外交上成為不理性的國家，就連中國對此難題也十分頭痛。但即便不同意見的執政群體有相反的兩岸方針，大致上在最後仍會遷就一般民間的動向，因此執政群體常常難以實踐或執行原訂的兩岸方針。

不過兩岸關係的互動變化，將是台灣內部的三種意見群體觀望與模仿學習的可能結構之一，因此，未來這些意見群體是否會改觀，仍然是未知數。目前可以確定的是，看似沒有共識的三個意見群體，實際上都不希望兩岸發生戰爭，或是成為最原始的霍布斯文化狀態。

也因此，2000年至2008年之間的政府在兩岸方針與互動上，

並不受到好評。而 2008 年政黨輪替之後，政府在兩岸方針與互動上卻能有一定程度的支持，這是因為康德文化的方針包含了防止戰爭發生、防止兩岸關係持續惡化的期許。然而要真正實踐這些目標，一部分也有賴國際層級中的他者之認同，例如前述的角色認同。

其次，於國際層次上，美國、中國、台灣的互動關係都是雙邊式，在對兩岸關係認同各自不同的情況下，具有三種的組合與衝擊後的可能結果。以下依序分為：洛克文化對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對康德文化，以及霍布斯文化對康德文化，來進行討論與比較。

## 壹、洛克文化對霍布斯文化

美國與中國對兩岸關係的認同差異是洛克文化對霍布斯文化。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十分特別，除了互賴關係複雜，更有許多矛盾因素。就國力而言，美國雖在中國之上，但中國卻在地位與影響力上有威脅美國的可能性，<sup>76</sup>並且雙方在國際上常常需要彼此的相互協助，不論是實質或精神（言語）上的幫助，再加上早期（冷戰）特殊的關係，使得雙方既想從關係中獲利卻也提防對方，尤其在中國崛起的前期，美國更是小心謹慎。

這些背景也影響雙方在兩岸關係認同差異的碰撞，美國態度上是極力反對兩岸發生具毀滅主權可能性的所有行動，且總是以制衡中國的方式在操作，這使得中國不得不受到美國霸權意見的影響，而建構出一套新的對台策略。

---

<sup>76</sup> 蔡東杰譯，Joseph S. Nye Jr. 著，2002，《美國霸權的矛盾與未來》。台北，左岸文化。頁 64-70。

相對地，美國在國際中越來越依賴的國家也是中國，在不超越與中國交惡的界線為前提上，時常需要配合中國的意見（或是逐漸妥協），因此，除了明確堅持幾項維持兩岸現況的條件（包含美國能持續介入兩岸的條件），其他則以敷衍的方式對應中國。但整體而言還是依照其所認同的國家利益在行動。<sup>77</sup>

一般而言，當洛克文化遇上霍布斯文化，應該是洛克文化轉降為霍布斯文化。然而在此處，美國卻能維持認同立場，甚至可能迫使中國至少在表面或形式上改變為洛克文化（或許是內化程度低的洛克文化），來面對兩岸關係。不過，中國未來是否能真正以洛克文化對待兩岸關係仍有待觀察（完全排除消滅台灣主權的行動與思維）。不過在這方面也不能排除，中國之所以反過來成為洛克文化，其實是藉由國際社會整體結構處於洛克文化所習得的立場態度所致。

## 貳、洛克文化對康德文化

美國與台灣對兩岸關係的認同差異為洛克文化對康德文化。美國與台灣的關係建立在過去，且兩岸議題常被認為是美國一手造成或刻意留下的問題，這讓美國與台灣之間，有著看不見的不成文附屬關係並持續至今。

基於以上背景，雖然台灣目前轉以康德文化看待兩岸關係，但美國一直以來未曾改變兩岸關係「維持現狀」的立場，因此未來台灣的認同還會是受制於美國的認同。即便美國態度上不否定台灣與中國能發展友好關係，但對美國而言，維持現況幾乎等於

---

<sup>77</sup> 楊明娟，2010年5月28日，〈歐巴馬主義 看重與中國交往 鼓勵兩岸降低緊張〉，中廣新聞網，[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id=1&id2=2&nid=244489](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id=1&id2=2&nid=244489)。

「保持美國介入兩岸的空間」。<sup>78</sup>這使得近來轉為康德文化認同的台灣，面臨重要的認可關卡，也就是與中國友好程度的界限為何。

但由美國對台軍售仍舊持續的狀況來看，<sup>79</sup>除了是美國固有的手段之外，也可以說明，「台灣需要防衛自身的武裝」表示現階段並非安全的康德文化，但也不是霍布斯文化。不論如何，維持兩岸和平並不會對美國的利益造成太大的影響，重點在於維持雙方的獨立現狀。

若因為認同轉變，使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好過於美國，則美國就有出手阻撓的可能（或是以小手段進行警示，諸如中國軍事有可疑動向的報告）。不論如何，美國並不需要明示界線。反之，若以不超越界線為前提，讓美國保持其所希望的洛克文化狀態，則台灣可以持續實踐目前的認同立場，但卻是一種受限制的康德文化認同，無法過於深入，這是因為，康德文化（或是其他的文化認同）本身雖然沒有與統獨有直接的關係，但比照中國最先要求來看，最後還是有走入實際的一中框架之可能性存在，這也是美國所不願看到的。

## 參、霍布斯文化對康德文化

中國與台灣對兩岸關係的認同差異即為霍布斯文化對康德文化。中國與台灣是兩岸關係的主體，就現今而言，中國在兩岸議題主導上往往處於上風，台灣則身處特殊環境中，在依附強權或抗衡之間難有選擇空間。但從共識面來看，雖然雙方對於兩岸意見有所分歧，近來卻對和平發展有初步共識，不過於互動關係的

---

<sup>78</sup>林寶慶，2010年7月2日，〈美國務院『美對台軍售 不會與他國諮商』〉，聯合新聞網，<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I/5699804.shtml>。

<sup>79</sup> 同上註

背後，其文化認同差距卻較前兩種組合要大得多。

中國由於美國的因素與台灣兩岸方針的改變，產生一套新瓶裝舊酒的互動策略，讓外界改觀也包含在中國的戰略中，<sup>80</sup>雖然手段不一樣，最後還是想消滅台灣主權。但台灣卻由於迫切的需求與觀念轉變（與先前執政不同），加上中國附和回應和美國貌似支持兩岸和平發展，因此產生與中國成為朋友、中國不是敵國的認同。

一般來說，康德文化遇上霍布斯文化應該是轉降為霍布斯文化居多，但在此處，中國詭異的霍布斯文化具有掩護作用，可能較不易認清，而台灣的康德文化反而較像是迫於形勢所致，因而不易改變。也就是說，雙方都沒有改變本身既定或希冀的立場狀態，在未來的互動中或許能漸漸發現彼此被扭曲的認同，而這種認同落差將可能產生問題。

如果最後是霍布斯文化可能使友好關係歸零；洛克文化則是現況維持的狀態（不論先前友好關係的發展到何種程度、獲利多寡，理論上只要維持雙方政治上的距離即可）；康德文化似乎是過於理想，一旦成真，兩岸友好關係可能如同英國與美國（不過美國的立場卻不能如此簡單地忽視）。

## 肆、小結

整體而言，在這兩個三角認同上的混亂，於國內層次，讓台灣對內無法形成一個更為確實的共識；於國際層次時，台灣對外行動則仍需遷就於兩強的認同（所期望的目的）影響，再加上前

---

<sup>80</sup> David Shambaugh, 2005,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3, pp. 64-95.

述國內的認同差異過於分歧，因而對外認同的明確與穩定性不足，難以真正實踐本身的認同。

國際層次上，台灣對於兩岸互動的認同，以及在國內層次上，執政黨對兩岸關係的認同，均屬於康德文化。社會建構學派中，康德文化為國際行為者互動與合作的最高與最佳層次，然而面對國力極端不對稱的情況，單方面的認同錯誤或雙方的認同矛盾，可能的負面影響將遠高於預期利益。

但是在這種認同建構的互動中，台灣或許能發揮概念方面的影響，進而影響中國對台灣及兩岸關係的看法，而不再是被侷限在物質力量為主的世界中。

也就是說，以過去的物質觀點來看，台灣的作為並不會對兩岸關係造成關鍵的影響，整體仍然受制於海陸兩霸權之手。但若加入觀念及建構來看，台灣卻有可能改變中國或美國的觀念，進一步影響到兩岸關係，使其產生變化，當然前提可能要先統合內部意見，才能有較明確而穩定的方向，如此一來，對外的認同也將更加強化。





# 第五章 結論

##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建構學派的三種文化或認同的概念，不僅有助於說明國際間對兩岸關係的認同狀態，也可解釋國內部分對兩岸關係的分歧。這種將認知差異運用在兩岸關係上，可類比為雙重賽局加上建構學派的整合運用，能夠發現兩岸關係認同差異中，台灣的部分是如何受到內外因素影響而轉變。因此，雖然建構學派分析層次的模糊，但反而增加對兩岸關係描述力。

在理論的部分，Wendt 重視本理論的社會建構主義雖然無法如願解決目前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之間的知識論之爭。但 Wendt 的社會建構主義卻能藉由對本體論的強調，讓國際關係理論的演進，開拓出另一個方向的討論模式與焦點。

另一方面，關於 Wendt 的社會建構應用在案例研究方面，如同前述，主要可分為認同形成與利益的關係，以及觀念結構對於國家認同形成的兩種方式。

這些都圍繞著一個主軸，也就是結構與能動者之間的互動，以及科學實在論所反映的本體論。在運用上一方面需顧及本體論的主張，一方面也結合能動者與結構的相互建構之特色，還有行為者之間的認同。因此，為了避免過於混雜，並使其更加明確，便成為在使用 Wendt 的社會建構時必須面臨的課題。

此外，理論主要有三大功能，而不同類型的理論與主張，將直接影響到這些功能的強弱程度。三大功能亦即解釋、描述，以及預測。以 Wendt 的社會建構的立場而言，並不像新現實主義一

樣擁有強大的解釋力，相對地，Wendt 的社會建構偏重在描述力方面。對於研究的事物，需要以何種類型的功能為重，這也成為運用 Wendt 社會建構時所需進行的考量。

## 第二節 後續研究

實際上，建構主義本身，就 Wendt 與其它建構主義學者而言，其淵源廣泛，甚至包羅萬象，包含了韋伯的詮釋社會學、詮釋學、符號互動論、各類型的馬克思主義、後結構主義、結構化理論等。其包含的科學含蓋了社會學、科學哲學等。面對如此龐雜的思想背景，其實要全部進行深度探討，得知其全貌是有困難度的。

之所以選擇以 Wendt 的社會建構做為討論的重點是因為，Wendt 的社會建構有較為完整的理論著作，此外，Wendt 的社會建構對於主流理論，特別是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具備一定程度的連結。在探索 Wendt 的社會建構的同時，也必須回顧過去理論的發展，其實也一併發現了許多新的研究目標。

例如，重新回到理論發展史的範圍，可以研究探索物質與概念之間的消長互動，再次探討理論之間的對立與對話是否有所成果，未能解決的問題是否能藉由後續的理論補足，或是就如此受到遺忘，成為尚未解決的問題。

或者，於擴大研究範圍方面，運用 Wendt 社會建構討論兩岸認同差異時，除了國際層面的三個重要關係行為者之外，對於三者內部也一起討論。也就是說，不單只是處理台灣內部的認同差異，對於美國與中國內部的認同差異也進行探討，如此一來，較為完整的三角架構便可成行，而對台灣、美國，以及中國內部的建構關係也能有更完整的描述。

另一方面，關於 Wendt 在 1999 年出版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一書之後，學者間對於其以科學實在論來取代第三次大論論關於知識論上的爭辯之主張，態度也不盡相同。Keohane 支持並肯定 Wendt 將科學實在論導入國際關係理論之中。不過，反對者如 Steve Smith 等人者大多質疑 Wendt 中間道路的可行性，並被認為是十分困難的。

從以上的爭執中，對於 Wendt 中間路線的社會建構，到底對國際關係造成哪些衝擊，各方學者又有哪些意見，也可能成為一項探討的目標。不論如何，Wendt 社會建構本身便充滿了嘗試性，在運用上也必然遭遇相同的議題。



# 參考書目

## 壹、中文資料

### 一、書籍

- 王高成主編，2009，《當代戰略思想之省思與前瞻》。台北：時英出版。
- 朱涇源，1999，《撰寫碩博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書局。
- 宋興洲，2005，《動態的東亞經濟合作：理論性爭辯與實踐》。台北：鼎茂圖書。
- 肖鋒譯，2006，Vendulka Kubalkova 主編，《建構世界中的國際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易君博，2006，《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
- 易君博，1990，《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
- 胡祖慶譯，1997，Kenneth N.Waltz 著，《國際政治體系理論解析》。台北：五南。
- 高德源譯，2002，Jack Donnelly 著，《現實主義與國際關係》。台北：弘智文化。
- 秦亞青主編，2006，《文化與國際社會: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翁明賢主編，2007，《新戰略論》。台北：五南。
- 莫大華，1993，《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研究》。台北：時英。
- 葉至誠、葉立誠，2001，《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台北：商鼎出版社。
- 張亞中主編，2007，《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文化。
- 陳牧民，2009，《國際安全理論—權力、主權與威脅》。台北：五南。

- 陳偉華，2003，《軍事研究方法論》。桃園：國防大學。
- 郭樹勇，2001，《建構主義與國際政治》。北京：長征出版社。
- 趙明義，1994，《國際區域研究》。台北：黎明文化。
- 趙萬里，2001，《科學的社會建構—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理论與實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蔡東杰譯，2002，Joseph S. Nye 著，《美國霸權的矛盾與未來》。台北，左岸文化。
- 衛民，2007，《兩岸是人為造成的制度：以建構主義為本體論的新制度分析》。台北：韋伯文化。
- 韓培爾編著，2003，《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Q&A》。台北：風雲論壇。

## 二、期刊

- 石之瑜，2000，〈現實主義國際政治學的知識脈絡〉，《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7 期，頁 37-53。
- 袁鶴齡，2000，〈國家認同外部因素之初探美國因素、中國因素與台灣的國家認同〉，《理論與政策》，第 14 卷，第 2 期，頁 141-163。
- 莫大華，2002，〈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的原型、分類與爭論—以 Onuf、Kratowichil 和 Wendt 的觀點為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5 期，頁 111-148。
- 莫大華，2000，〈國際關係理論大辯論研究的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12 期，頁 65-90。
- 莫大華，1999，〈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9 期，頁 93-109。
- 黃旻華，2000，〈評『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11 期，頁 71-94。
- 廖舜右，2006，〈Thomas Kuhn 與 Imre Lakatos 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爭論〉，《政治科學論叢》，第 29 期，頁 31-48。

鄭瑞耀，〈國際關係「社會建構主義」評析〉，《歐美季刊》，第 15 卷，第 2 期，2001 夏季號，頁 199-229。

### 三、網路資料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9 年 12 月，〈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民眾對兩岸關係的看法〉，

<http://www.sef.org.tw/public/Attachment/01410152671.xls>。

林寶慶，2010 年 7 月 2 日，〈美國務院『美對台軍售 不會與他國諮商』〉，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I/5699804.shtml>。

胡錦濤，2008 年 12 月 31 日，〈「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30 周年座談會演講稿〉，

<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18824/2008/12/31/2225s2379738.htm>。

馬英九，2008 年 5 月 20 日，〈中華民國第 12 任總統就職演講稿〉，

[http://www.rti.org.tw/big5/topic/2008/520/news\\_080520n.aspx](http://www.rti.org.tw/big5/topic/2008/520/news_080520n.aspx)。

國台辦，2005，《反分裂國家法》，

[http://www.gwytb.gov.cn/gzyw/gzyw1.asp?offset=150&gzyw\\_m\\_id=596](http://www.gwytb.gov.cn/gzyw/gzyw1.asp?offset=150&gzyw_m_id=596)。

黃悅嬌，2010 年 6 月 28 日，〈綠堅持反 ECFA 咬定台灣開放一定越來越多〉，中時電子報，

<http://news.chinatimes.com/politics/0,5244,130502x132010062800547,00.html>。

黃悅嬌，2010 年 6 月 25 日，〈反 ECFA 台聯：中國讓利 包糖衣毒藥〉，中時電子報，

<http://news.chinatimes.com/politics/0,5244,130502x132010062500964,00.html>。

華視新聞網，2010 年 4 月 25 日，〈雙英辯論全文摘要〉，

<http://news.cts.com.tw/cna/politics/201004/201004250458560.html>。

楊明娟，2010年5月28日，〈歐巴馬主義 看重與中國交往 鼓勵兩岸降低緊張〉，中廣新聞網，  
[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id=1&id2=2&nid=244489](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id=1&id2=2&nid=244489)。

## 貳、西文資料

### (I) Books

- Baldwin, David A., 1993,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hasker, Roy, 1989,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 Biersteker, Thomas J. and Cynthia Weber, eds., 1996, *State Sovereignty as a Social Construc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oth, Ken, and Steve Smith, eds., 1995,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Bull, Hedley, 1977, *The Anarchical Socie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uzan, Barry,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eds., 1993, *The Logic of Anarc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ox, Robert, 1987,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Feyerabend, Paul, 1975, *Against Method: 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 Theory of Knowledge*. London: New Left Books.
- Fierke, Karin M. and Knud Erik Jergensen eds., 2001,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Next Genera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 Frankel, Benjamin, 1996, *Realism: Restatements and Renewal*. Great Britain: Frank Cass & Co. Ltd. Press.
- Hacking, Ian, 1999,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ollis, Martin, and Smith, Steve, 1991,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plan, Morton A., 1957,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Press.
- Katzenstein, Peter J. ed., 1996,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ed., 1986,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 Kuhn, Thoma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atos, Imre, 1978,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katos, Imre, and A., Musgrave, 1970,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katos, Imre, and P., Feyerabend, 1999, *For and Against Metho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ingst, Karen, and Snyder, Jack (ed.), 2001, *Essential Reading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Company.
- Smith, Steve, Booth, Ken, and Zalewski, Marysia (ed.), 1996,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Little Brown.

Wendt, Alexander,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ehfuss, Maja, 2002,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olitics of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I) Periodicals

Adler, Emanuel, 1997, "Seizing the Middle-Ground: Constructivism  
in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3, p. 331.

Alker, Hayward R., "On Learning from Wend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pp. 141-150.

Ashley, Richard K., 1984, "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8, No. 2, pp. 225-286.

Bostock, Ian, 2005, "US Alliance Disturbs Australian-China Clam,"  
*Jane's Defense Weekly*, Vol. 42, No.11, p. 15.

Campbell, Kurt and Mitchell, Derek, 2001, "Crisis in the Taiwan  
Strait,"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4, pp. 14-25.

Checkel, Jeffrey T., 1998, "The Constructivism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3, pp. 24-48.

Glaser, Charles, 2003, "Structural Realism in a more complex worl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9, pp. 403-414.

Glaser, Charles, 1996,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Security Studies*, Vol. 5, Issue 3, pp. 122-163.

George, Jim, 1989,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Search for

- Thinking Space: Another View of the Third Debat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3, pp. 269-279.
- Goldstein, Avery, 2001, “The Diplomatic act of China’s Grand Strategy: A Rising Power’s Emerging Choice,” *China Quarterly*, No. 168, pp. 861-863.
- Harrison, Ewan, 2002, “Waltz, Kant and Systemic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8, pp. 143-162.
- Healy, Marilyn, and Perry, Chad, 2000, “Comprehensive criteria to judge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within the realism paradigm,” *Qualitative Market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3, No. 3, pp. 118-126.
- Makinda, Samuel M., 2000,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ok review),”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6, Issue 2, p. 345.
- Nexon, Daniel H., 2009.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Balance," *World Politics*, Vol. 61, pp. 330-359.
- Ness, Peter Van, 2005, “Why the six Party Talks Should Succeed,” *Asian Perspective*, Vol. 29, No. 2, pp. 231-246.
- Reus-Smit, Christian, 1997, “The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Nature of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4, pp. 555-589.
- Runyan, Anne Sisson and V. Spike Peterson, 1987, “The Radical Future of Realism: Feminist Subversion of IR Theory,” *Alternatives*, Vol. 12, pp.403-434.
- Schweller, Randall L., 1996,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 5, Issue 3, pp. 90-121.
- Shambaugh, David, 2005,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Regional

-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3, pp. 64-95.
- Swaine, Michael, 2004, “Trouble in Taiwan,” *Foreign Affairs*, Vol. 83, No.2, pp. 39-49.
- Taliaferro, Jeffrey W., 2001,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consider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pp. 128-161.
- Tickner, Ann, 1997, “You Don't Understand: Troubled Engagements Between Feminists and IR Theor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4, pp. 611-32.
- Walker, Thomas C., and Morton, Jeffrey S., 2005, "Re-Assessing 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Thesis: Is Realism Still Domina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7, pp. 341-356.
- Waltz, Kenneth N.,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pp. 5-41.
- Waltz, Kenneth N., 1997, “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1 No. 4, pp. 913-917.
- Wendt, Alexander, 2004. “The State as Person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Revie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2, pp. 289-316.
- Wendt, Alexander, 2003. “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9, No. 4, pp. 491-542.
- Wendt, Alexander, 2001, “Driving with the Rearview Mirror: On the Rational Science of Institutional Desig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 4, pp. 1019-1049.
- Wendt, Alexander, 2000, “Forum on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pp. 123-124.
- Wendt, Alexander, 2000, “On the Via Media: a Response to the Cr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pp. 165-180.

- Wendt, Alexander, 1998, "On Construction and Caus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pp. 101-117.
- Wendt, Alexander, 1995,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p. 71-81.
- Wendt, Alexander, 1994,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No. 2, pp. 384-396.
- Wendt, Alexander, 1992,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pp. 391-426.
- Wendt, Alexander, 1987,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pp. 335-370.